

吳橋兵變：明清鼎革的一條重要導火線*

黃一農**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摘 要

崇禎四年（1631）八月，皇太極親率大軍圍攻關外的大凌河城；閏十一月，孫元化（1581-1632）奉命派孔有德（c.1604-1652）救援，結果該支部隊在北直隸的吳橋叛變，稍後降金。叛變的導火線表面上只是一件因奪雞所引起的軍民衝突，但卻造成類似「蝴蝶效應」（Butterfly Effect）的後果，對明清鼎革產生深遠影響。由於這場明末最大兵變缺乏上述角度的專題研究，為釐清其歷史意義，筆者除嘗試對吳橋之亂的前因及經過作一較完整的析究外，還將追索孔有德、耿仲明（?-1649）、尚可喜（1604-1676）、吳三桂（1612-1678）等遼人家族及其部眾，如何在此一事件後乘勢崛起；並在滿清入主中原的過程中，從關遼裨將躍升權力核心，最後又如何在三藩之亂（1673-1681）後全面退出歷史舞台。

關鍵詞：明清史，軍事史，吳橋兵變，孔有德，孫元化

* 此研究乃國科會計劃「十六、七世紀傳至亞洲之歐洲火砲研究」（NSC 96-2411-H-007-003-MY3）之成果，並受清華大學增能計畫「近代東西文明之遭遇與衝撞」之支持，特此誌謝。文中所引筆者先前已出版之論文，均可自本人網站（<http://hss.nthu.edu.tw/~ylh/>）全文下載。

** 作者為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特聘講座教授暨中央研究院院士。電子郵件信箱：ylhuang@mx.nthu.edu.tw

一、前言

自努爾哈赤（1559-1626）於萬曆四十六年（天命三年，1618）以七大恨為由興兵抗明以來，在不到三十年的時間，只有幾十萬人口的滿族就已入主中原，肇建一個由多民族共治且長達二百多年的大帝國。先前學界對明清易代原因的探究，基本上是在民族革命、王朝更替、階級革命、世界性經濟危機以及自然災害等解釋模式中展開的；（註1）然而，除卻考量這些複雜且多元的宏觀背景因素外，源自軍事史角度的基礎研究，尤其是對皇太極稱帝之前史事的深入探討，仍有許多尚待努力的空間，當中更以遼人（此一名詞在明末即已行用，專指定居關外的漢人）以及東江（泛指以皮島為中心的遼東半島近海諸島嶼）海上長城所扮演的角色，最不為人所知。（註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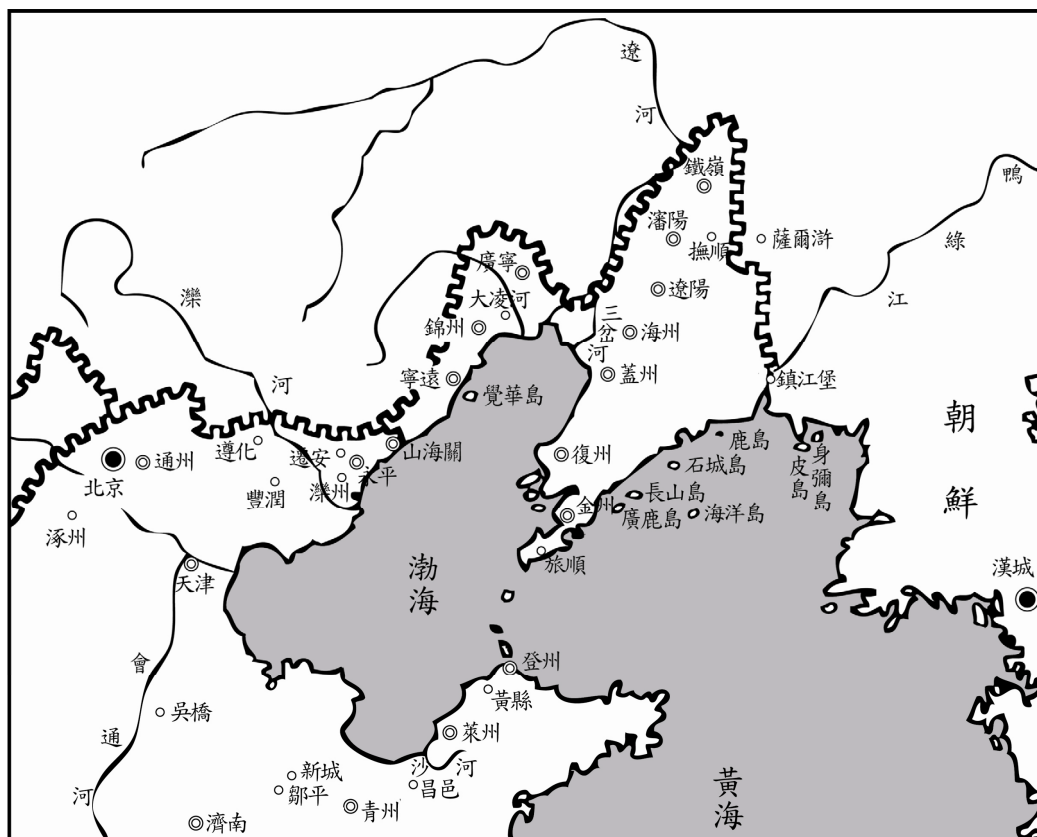
天啟元年（1621），瀋陽與遼陽兩邊外重鎮先後被努爾哈赤攻陷，明朝舉國震驚，熊廷弼（1569-1625）因此重被起用為遼東經略，他嘗疏言：「恢復遼左，須三方布置：廣寧用騎步對壘於河上，以形勢格之，而綴其全力；海上督舟師，乘虛入南衛，以風聲下之，而動其人心，奴必反顧而亟歸巢穴，則遼陽可復。」（註3）於是新設登萊巡撫，兼管東江等地，希望能部署一道海上防線，以牽制金國後方，並與從廣寧至山海關的陸上防線相呼應，且在山海關特設經略（圖一），以節制三方，統一事權。雖然啟禎兩朝對此「三方布置策」該如何施行並無持續的共識，但相關兵力的配置則不出此一輪廓。

如明廷於天啟二年即在鴨綠江口的皮島設置總兵官，以毛文龍（1576-1629）為首任島帥，希望能對金國發揮「進可攻、退可守」的積極作用。但很不幸地，毛氏卻未以國事為己任，不僅偏安一隅，從事貿易，謀取私利，甚至冒餉侵糧，偽造戰功。崇禎二年（1629）六月，遼東督師袁崇煥（1584-1630）以尚方寶劍斬殺毛文龍，但袁氏亦於十二月金軍侵擾京畿時（史稱「己巳之役」）下獄，並在翌年棄

1. 劉志剛，〈時代感與包容度：明清易代的五種解釋模式〉，《清華大學學報》，2（北京：2010），頁42-53。

2. 參見黃一農，〈劉興治兄弟與明季東江海上防線的崩潰〉，《漢學研究》，20.1（臺北：2002），頁131-161；黃一農，〈e-考據時代的新曹學研究：以曹振彥生平為例〉，《中國社會科學》，2（北京：2011），頁189-207。

3. 《明熹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景印舊鈔本），卷11，頁543。



圖一：明末的遼東、山東與東江地區

市，邊事自此更加滋擾。^(註4)而在「後毛文龍時代」崛起的劉興祚(?-1630)、劉興治(?-1631)兄弟，則因緣際會掌握了東江地區的主要兵權。

崇禎三年四月，留駐皮島署前協事的都司劉興治，因忿其兄興祚戰死後未獲恩恤，且劉氏一家的忠貞亦受到懷疑，遂起而殺署島副總兵陳繼盛，並與金國熱絡往還；劉家不僅徘徊周旋於明、金兩大政權之間，甚至還曾起意自立基業。六月，兵部尚書梁廷棟因孫元化(1581-1632；天主教士大夫徐光啟[1562-1633]的同教門生)素為興治所憚，特破格薦用他為登萊巡撫，^(註5)除巡撫登州(今蓬萊市)、

4. 李光濤，〈毛文龍釀亂東江本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9(臺北：1948)，頁367-488；陳生璽，《明清易代史獨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199-261。

5. 天啟元年新設此職，崇禎二年罷，三年復設；參見方汝翼、賈瑚修、周悅讓、慕榮幹纂，《增修登州府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中國地方志集成》景印光緒七年刊本)，卷12，頁5。另，由於當時教會人士積極引進西洋火砲和兵學，並在明末的軍事史中擁有一席之地，故在下

萊州和東江外，兼恢復金州、復州、海州和蓋州之責。十一月，登萊總兵黃龍奉命赴皮島擔任都督，但他卻格於當地局勢的渾沌一直稽延行程。（註6）

四年三月，皮島諸將領內鬩，張燾（?-1632；為天主教士大夫李之藻〔1565-1630〕的同教門生）（註7）和沈世魁等起而殺劉興治，導致劉家在東江權傾一時的勢力完全瓦解。當時明廷對東江戰略地位的態度十分分歧，兵部尚書梁廷棟主張「用島」，並聲稱「撤海之罪，同於棄地」，但他旋即去職。而做為東江諸島直屬長官的登萊巡撫孫元化，以「東島之兵，養十年，實皆無用」，且稱「海禁開而鮮人得為奴轉輸，真文龍之罪也；文龍誅而仍不撤海以收近局，是則崇煥之罪也」，故主張「撤島」，惟以眾說紛紜，終無成議。（註8）

六月，皇太極（1592-1643）以皮島新遭變亂，或可乘機襲佔，乃調派數千步騎進攻，新出鎮皮島的黃龍遂命贊畫副總兵張燾出戰。張燾督大小兵船百餘艘迎戰，並令公沙·的西勞（Gonçalo Teixeira Correa, ?-1632）等十三名來自澳門的隨軍砲手發西洋大砲，協助締造了被遼東巡撫丘禾嘉形容為「海外從來一大捷」的「麻線館之役」（又稱「麻廂之役」），暫時阻止金國對東江諸島的覬覦。（註9）

同月，新任兵部尚書的熊明遇，因擔心防禦戰線過長，遂命在大凌河城的孤軍撤還，但總兵祖大壽以城方新築而不忍棄。八月，皇太極以精銳數萬圍攻大凌河。十月，祖大壽降，旋被金人放歸。由於東江一再發生變亂，且罕有牽制敵兵之能，孫元化因此下令撤回島眾。十月，張燾率舟師一千三百人撤離皮島，但黃龍則藉口遲留不去，沈世魁亦不願歸，孫元化於是命黃龍率兵登岸牽制金軍，但他卻僅虛張聲勢，並未發兵。

十一月初四日，黃龍因隱沒兵士賞銀，且剋扣月餉，致引起譁變。叛兵把黃龍拘於私第，拷打至重傷，甚至風傳其耳鼻俱被割去，孫元化初欲以毛文龍的養子毛

文中亦先將奉教之人點出，以備後文的討論。

6. 此段參見黃一農，〈天主教徒孫元化與明末傳華的西洋火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7.4（臺北：1996），頁911-966。
7. 龔纓晏、馬瓊，〈關於李之藻生平事跡的新史料〉，《浙江大學學報（人社版）》，38.3（杭州：2008），頁89-97。
8.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遼寧省檔案館編，《中國明朝檔案總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第12冊，頁128；張世偉，《張異度先生自廣齋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四庫禁燬書叢刊》景印崇禎十一年刊本），卷12，頁24-25。
9. 包括《崇禎長編》、《國權》、《滿文老檔》在內的明清文獻均未記此役，而天主教人士的描述則或有浮誇之嫌，如張燾嘗稱「西洋一士可當勝兵千人」，韓雲稱「擊死奴酋七百餘人」，耶穌會士湯若望亦謂「殄敵萬餘」。參見董少新、黃一農，〈崇禎年間招募葡兵新考〉，《歷史研究》，5（北京：2009），頁65-86。

承祿權攝島事，繼改委沈世魁；後又疑世魁參與變亂，態度猶豫不決。熊明遇於是建議取消東江總兵之設，改由一副總兵負責島事，黃龍則遭革任聽勘，另委派監軍王徵（1571-1644；天主教徒）往查致變的情由，並執拿首亂。然而，王徵或尚未及成行，情勢就急轉直下，此因朝鮮移檄問罪，島眾擔心食糧遭斷絕，且尚可喜（1604-1676）等將領亦率兵至島平變，遂於二十八日殺帶頭倡亂的耿仲裕等十餘人，扶黃龍復出視事，仍任登島總兵，然明軍在皮島的戰力已大受傷害。（註10）

當明廷甫處理完東江的亂事，卻在四年閏十一月爆發影響更深遠的「吳橋之變」，令「三方布置策」因而解體，所佈署的各支精銳明軍亦先後降清，甚至轉而協助清軍以雷霆萬鈞之勢征服大明江山（見後文）。然而，先前對此一兵變的研究既少且不夠深入，（註11）如在《明史新編》、《晚明史》之類的通史或在《中國明代軍事史》之類的專史中，均不見片言隻字；至於《清代通史》、《洪業：清朝開國史》和《劍橋中國明代史》等書中，亦只有極簡略的敘述，其內容往往不出雍正十三年（1735）定稿的《明史》；唯有在《三藩史略》中有專章論此，但仍有許多疏漏與訛誤。（註12）為深入探索吳橋之變的歷史意義，筆者先前曾專程赴國內外幾間圖書館，抄閱時人所撰寫的幾本較罕見的著述，（註13）並努力爬梳中、韓

10. 此段參見汪楫等，《崇禎長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景印舊鈔本，1962），卷52，頁30；春秋館編，《朝鮮仁祖大王實錄》（漢城：探求堂，1981，《朝鮮王朝實錄》本），卷25，頁39-42；王徵著、李之勤輯，《王徵遺著》（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7），頁147-149；羅振玉校錄，《平南敬親王尚可喜事實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景印民國十三年鉛印本），頁1；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等編，《中國明朝檔案總匯》，第12冊，頁128-130。
11. 如見宋伯胤，〈孫元化與吳橋兵變〉，《天津益世報·人文週刊》（天津），新32期，1947年12月15日；宋伯胤，〈孔有德底叛明與降清：敬覆郭慕天先生〉，《天津益世報·人文週刊》（天津），新43期，1948年3月15日；李學智，〈孔有德、耿仲明降清始末及明史黃龍傳考〉，《幼獅學報》，1.1（臺北：1958），頁1-24；神田信夫，〈孔有德の後金への來歸：「天聰七年檔」の検討を通して〉，收入《東方學會創立五十周年記念東方學論集》（東京：東方學會，1997），頁431-444；黃一農，〈天主教徒孫元化與明末傳華的西洋火砲〉。
12. 蕭一山，《清代通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1），頁143-146；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點校本），卷248，頁6430-6437；楊國楨、陳支平著，《明史新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毛佩奇、王莉，《中國明代軍事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樊樹志，《晚明史（1573-1644年）》（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滕紹箴，《三藩史略》（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頁97-123；Frederic E. Wakeman, Jr., *The Great Enterprise: 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p. 196-200;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7: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Frederick W. Mote & Denis Twitchett ed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t. 1, pp. 617-618.
13. 參見黃一農，〈崇禎朝「吳橋兵變」重要文獻析探〉，《漢學研究》，22.2（臺北：2004），頁

兩國相關的檔案文獻，下文即嘗試對此變的前因、過程和影響作一較完整的析探。

二、兵變的背景與發生

吳橋之變與崇禎四年（1631）的大凌河之役息息相關。七月，明軍築大凌河城，工程甫竣，金兵即於八月初六日以精銳一萬五千人攻至，並掘深壕將城中三萬餘軍民層層圍困。駐鎮山海關的大學士孫承宗遂遣張春、吳襄、宋偉率四萬多名馬步兵往救，但於九月二十七日在距大凌河十五里（明清時期一里約合零點五七六公里）處的長山被擊潰。《滿文老檔》稱：「自征明以來，較之以前，此次殺敵明兵甚多。」（註14）十月，金軍首度使用俘獲以及自製的紅夷砲攻堅，令遠近百餘臺俱降。二十八日，因城中糧盡援絕，甚至已到人人相食的慘況，守將祖大壽不得已率尚存的一萬一千六百八十二名軍民請降，以其子可法為質，並殺害不從的副將何可剛。金人旋即毀大凌河城班師，且將投降之軍民俱薙髮。孫承宗因遭廷臣交章疏劾，責其築城招攬且喪師辱國，遂奪官閒住，不再起用。（註15）

先是，當祖大壽之子可法赴敵營議降時，即曾強烈要求金國在受降後應繼續攻取錦州，如此，眾人始可與妻、子相聚，否則「生亦何益」！大壽的義子祖澤潤亦對金國副將石廷柱稱：「若能設計將在北京之二弟救出，此乃兄全我祖氏之大恩也。」祖大壽也在降後建議由其親率兵詐逃入錦州，伺隙獻城。十月二十九日晚，皇太極因此命貝勒阿巴泰等率兵四千名，著漢裝偕祖大壽及其所屬三百五十人，偽作潰奔狀，企圖襲取錦州。惟因逢大霧，隊伍多失散，遂於天明各自收兵。而錦州明軍聽聞砲聲，以為大凌守軍突圍，嘗分路應援，但均遭擊敗。（註16）

十一月初一日，祖大壽攜二十六人步行入錦州。皇太極先前與諸貝勒議曰：

朕思與其留大壽於我國，不如縱入錦州，令其獻城為我效力。即彼叛而不來，亦非我等意料不及而誤遣也。彼一身耳，叛亦聽之。若不縱之使

361-385；黃一農，〈奎章閣明清軍事史重要文獻過眼錄〉，《奎章閣》，33（首爾：2008），頁235-239。

14. 任世鐸等譯，《滿文老檔》（北京：中華書局，1990），頁1151-1155。

15. 此段參見閻崇年，〈論大凌河之戰〉，《清史研究》，1（北京：2003），頁48-58；黃一農，〈紅夷大砲與皇太極創立的八旗漢軍〉，《歷史研究》，4（北京：2004），頁74-105。

16. 任世鐸等譯，《滿文老檔》，頁1162-1171；《清太宗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其餘各朝實錄均同此本），卷10，頁137-143。

往，儻明國別令人據守錦州、寧遠，則事難圖矣！今縱還大壽一人，而先攜其子姪及其諸將士以歸，厚加恩養，再圖進取，庶幾有濟也！

知其放歸祖大壽的決定，乃一心思極其細密之舉，因即使祖氏不依約獻出錦州，只要他仍掌兵權，其被俘的親友和部屬就足以令他投鼠忌器。而大壽為掩飾其貪生之舉，初竟疏奏自己是率兵突圍的。（註17）

稍後，祖大壽因不能或不願遵約獻錦州，遂在同僚的曲護之下，將脫歸一事改說成是施用奇計以賺歸，當事諸臣亦或希望能因此稍稍挽回敗戰的顏面。孫承宗在上疏時，更嘗巨細靡遺地「引述」祖大壽與皇太極的對話，以證明其「用計出圍」之說，崇禎帝因此還嘉許其「兵不厭智」；但祖大壽私下卻仍與金人互通往來，皇太極更嘗對其稱：「倘蒙天眷而事成，則以將軍為王，國自由爾專主……我將將軍與我諸貝勒並列，不與官員輩並列。」（註18）

在大凌河城被圍期間，明廷曾於崇禎四年八月二十二日發文命駐防在皮島的前協副總兵張燾率兵至旅順旁之雙島，與來自登州的參將黃蜚（黃龍之外甥，見後文）以及孔有德（c.1604-1652）部會師，再合兵至三岔河口（太子河與渾河一起匯入大遼河後，即稱作三岔河，自今營口市西邊注入渤海）和耀州鹽場（在今營口市附近），希望能從後方牽制敵人。九月二十七日，張燾率兵偕同葡籍軍官公沙·的西勞，分乘二十一艘船出發；但東江總兵黃龍不允其攜走先進的紅夷大砲，理由是要「留以進剿」。張燾所率的援兵至十月十七日始抵雙島，據其指稱，當時孔有德剛從三岔河遭颶風退返雙島，因孔氏回報三岔河結堅冰「不能飛越」，張燾於是差官至登州稟報此一困境；二十八日，遂接到改調覺華島之檄。（註19）

十一月初一日，張燾聲稱甫出發即又遇颶風，而自其於九月底出發以來，已先後有十二艘船嚴重損壞，其餘九艘雖經修補，仍時時漏水，故他請求再撥十四艘較堅固之船以載兵。且因先前公沙遭颶風時，行李和兵器盡失，「見在調理，力乞回澳」，而張燾指稱在麻線館之捷中，「西洋一士可當勝兵千人」，是他「向恃以為嘗（筆者按：即「常」字，避泰昌帝朱常洛之名諱）勝不敗者」，故懇請速發「西砲、西人、火藥、盔甲」，更希望能預給「開春糧錢」，以便購買禦寒之物；並請求當部隊抵達覺華之後，即照關寧之兵給足全糧。二十八日，奉旨：「海師風信，

17. 此段見《清太宗實錄》，卷10，頁143。

18.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等編，《中國明朝檔案總匯》，第12冊，頁2-5；《清太宗實錄》，卷10，頁143-144；任世鐸等譯，《滿文老檔》，頁1175-1176。

19. 此段參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等編，《中國明朝檔案總匯》，第12冊，頁84-87。

固難定期，日久奮圖，豈無一遇。如何張燾等只以遭颶壞缸為詞，著兵部看議來說。」（註20）知朝廷頗疑颶風乃為其赴援不力的藉口，江西道試御史劉宗祥因此抨擊稱：「若云海濤洶湧，則奴在凌三月，豈盡無風平浪恬之日。即迂道從狹江潛渡，興師急援，奴未必不畏其先聲。」（註21）

當大凌河城中食盡之際，張燾和孔有德所率領的援兵竟然還都羈留在雙島，不願或不敢涉險登陸救援。而當敗軍之將的祖大壽被金國放還時，反被描述成「設奇自振」、「忠智脫圍」。無怪乎廣西道試御史蕭奕輔嚴詞批評邊臣「欺罔特甚」，並稱：

甚至凌城已破，將卒被擄，而丘禾嘉等猶然以二十九晚遣兵劫營，賊眾驚亂，總兵祖大壽領萬二千人出城報功。向非水落石出，直吐情形，又一大奇捷矣！自有邊驚【警】以來，日事欺罔，諸臣不足誅，不意承宗大臣而出此也！

這些都在在突顯明廷腐敗之深。（註22）

由於張燾等一直未能從海路至三岔河牽制敵軍，兵部於是在十月二十三日命孫元化自陸路續發五千名援兵，但因當時登州的馬步兵總數尚不及三千人，元化乃於二十五日遣人至雙島調取孔有德和吳進勝之軍，至十一月十四日，部隊始齊集。由於當時皮島總兵黃龍甫被亂兵所拘，故元化乃留吳進勝軍在登州戒備，而命孔有德率兵一千人先行，王廷臣等將領則隨後發遣，（註23）通計此批援兵共四千四百七十二人，分攜馬一千零六十一匹、騾五百五十一頭、牛一百五十四隻、中西大小銃砲一千零三十四門等；元化自稱「從來援兵未必若此之盔甲、器械、鍋帳、輜車悉全者」，但諷刺的是，大凌河城守軍卻已於半個月前因各援兵的拖延蹉跎而力竭投降。（註24）

20. 同前引，頁 88-89。

21. 同前引，頁 134-137。

22. 同前引，頁 2-8、25-28、51-52、138-140、194-198；汪楫等，《崇禎長編》，卷 51，頁 33、卷 52，頁 3；《清太宗實錄》，卷 10，頁 141-142。

23. 王廷臣所統領的官兵一千一百三十餘名，暨家口、婦女一千二百餘名，乃於崇禎五年正月十三日出關，其時登州已遭叛軍攻陷，廷臣最後是在十五年二月清兵攻陷松山時被殺；參見汪楫等，《崇禎長編》，卷 55，頁 10。

24.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等編，《中國明朝檔案總匯》，第 12 冊，頁 147-148；沈徵佳，《江東志》（上海：上海書店，1992，《中國地方志集成》景印清代鈔本），卷 8，頁 11-12。

由於孔有德「初無往意，勉強前赴，沿途觀望」，甚至停駐鄒平（位於新城西南約二十公里處）月餘，（註 25）以致出發近兩個月始出山東省境，準備行至直隸河間府所屬之吳橋縣（距登州約五百公里）後，即改沿大運河至天津，再北出山海關。不料，此一部隊卻因細故而激起兵變，《明史》記其事曰：

是年，大凌河新城被圍，部檄元化發勁卒泛海，趨耀州鹽場，示牽制。有德詭言風逆，改從陸赴寧遠。十月晦，有德及九成子千總應元統千餘人以行，經月抵吳橋，縣人罷市，眾無所得食，一卒與諸生角，有德扶（筆者按：指用鞭、杖或竹板擊打）之，眾大譁。九成先齎元化銀市馬塞上，用盡無以償，適至吳橋。聞怨，遂與應元謀，劫有德，相與為亂。陷陵縣、臨邑、商河，殘齊東，圍德平。既而舍去，陷青城、新城，整眾東。（註 26）

《清史稿》亦稱：

天聰五年，太宗伐明，圍大凌河城。元化遣有德以八百騎赴援，次吳橋，大雨雪，眾無所得食，則出行掠。李九成者，亦文龍步將，與有德同歸元化，元化使齎銀市馬塞上，銀盡耗，懼罪。其子應元在有德軍，九成還就應元，咻（筆者按：指教唆）有德謀為變。所部陳繼功、李尚友、曹得功等五十餘人，糾眾數千，掠臨邑，凌商河，殘齊東，圍德平，破新城，恣焚殺甚酷。（註 27）

均指援軍至吳橋時，因「無所得食」而生亂，此與稍後孔有德致皇太極請降書中的說法一致。（註 28）至於適至吳橋的李九成，則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九成先前乃奉孫元化之命買馬，（註 29）但卻將款項蕩盡，由於自認重罪難逃，遂與其子應元

25. 張存武、葉泉宏，《清入關前與朝鮮往來國書彙編（1619-1643）》（臺北：國史館，2000），頁 580；談遷著，張宗祥標點，《國榷》（北京：古籍出版社，1958），卷 91，頁 5577。

26. 張廷玉等，《明史》，卷 248，頁 6431。

27. 趙爾巽等，《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6 年點校本），卷 234，頁 9395-9396。

28. 孔有德在信中稱：「前奉部調西援，錢糧缺乏，兼沿途閉門罷市，日不得食，夜不得宿，忍氣吞聲，行至吳橋，又因惡官把持，以致眾兵奮激起義。」此信原件不知現藏何處，轉引自蕭一山，《清代通史》，頁 144-145。

29. 登州備兵的目的原是為了支援遼東戰事，因而亟需可以陸戰之馬，由於「腹裏之馬低小柔脆，不堪

謀叛。

毛羈在其康熙五十五年（1716）成書的《平叛記》中，參考了許多第一手材料，因而對致亂的緣由提供了更多細節，稱：

發遼卒千人授遊擊孔有德、千總李應元往……初無往意，勉強前赴，沿途觀望，至閏十一月二十七日，次於吳橋。時官兵屢過地方多騷擾，以故民皆閉門，兵無食宿皆怨。適部卒與生員相爭，有德笞之，眾遂譁然（原註：時屯兵新城鄉紳王象春莊，白食雞犬，春子怒，先投其父名帖，復親講其兵不法狀，有德將兵捆打、貫耳，兵遂將莊焚燬，春子潛逃）。次日，千總李應元與其父九成縛有德於演武場，首倡反謀，有德從之（原註：九成初為元化市馬，馬價蕩盡，至吳橋，適與有德遇，遂與應元謀，以為反亦死，不反亦死，不如一逞，叛謀益決）。（註30）

然初讀此一記述，會懷疑當時在新城與吳橋是否先後均發生軍民衝突。（註31）惟因兩地的直線距離約達一百五十公里，很難理解若數天前眾兵已在新城釀出焚燬王氏莊園之大亂，何以要等到吳橋才激變。且若此說為確，亦很難解釋為何時人絕少將此一事件與新城相繫：除孔有德自稱是在吳橋起事外；（註32）歸莊應孫元化家人之請所寫的〈孫中丞傳〉中，亦稱「兵至吳橋，閉門罷市，不聽止宿，兵遂大掠」；監視登島太監呂直也指「孔有德肇亂於吳橋」；崇禎朝擔任京官的王家彥和馬世奇，分別稱此變為「吳橋之變」和「吳橋之事」；明末清初的史家鄒漪、查繼

戰鬥，必用口外夷種，方可應敵」，故通常均會遣人往大同、甘肅一帶購馬。參見陶朗先，《陶元暉中丞遺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叢書集成三編》景印民國二十五年刊本），卷上，頁14。

30. 毛羈，《平叛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70，《叢書集成續編》景印民國十七年排印本），頁1。

31. 明遺民文秉（1609-1669）亦稱奪難之事發生在新城，因官兵不滿該犯罪之同僚將被正法，遂說服已抵吳橋的前隊回兵叛變。惟文秉對此變的記述中有多處失實，如他誤稱陳有時和毛承祿二人在初叛時即加入（見後文）；且誤指叛軍「盡滅王象乾家」，當時王家主要人物應僅象復及其子與夔被殺（見後文）。筆者因疑入清後隱居在家鄉蘇州郊外撰述的文秉，對此變細節的掌握或欠詳實。參見文秉，《烈皇小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續修四庫全書》景印舊鈔本），卷2，頁38-39。

32. 孔有德和耿仲明在天聰七年（崇禎六年）四月十一日向金國的乞降書中，即稱：「前奉部調西援，錢糧缺乏，兼沿途閉門罷市，日不得食，夜不得宿，忍氣吞聲。行至吳橋，又因惡官把持，以致眾兵奮激起義。」參見馮其庸，〈兩樁歷史事實和兩件珍貴文獻〉，《紫禁城》，6（北京：2005），頁98-103。

佐和張岱，亦明確將事件地點繫於吳橋，或逕稱為「吳橋兵變」。(註33)

經查乾隆四十年（1775）奉敕撰的《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中有云：

十月晦，有德及九成子千總應元統千餘人以行，經月抵吳橋，天大雨雪，眾無所得食。新城邑紳王象春者有莊在吳橋，有德兵屯其地，卒或攫雞犬以食，王氏子怒訴之有德，有德笞卒以徇，眾大譁。九成先齎銀市馬塞上，用盡無以償，適至，聞眾怨，遂與應元謀劫有德為亂，有德從之還。(註34)

始知《平叛記》中的小註並非記載另次衝突，而是對正文的補充，只不過毛昺並未清楚指出事件所在地乃王象春（1578-1633）家位於吳橋之莊園，反而在字裡行間讓人誤以為該莊在王氏老家新城。

至於釀禍的王象春之子，有誤認是與仁（後改名山立），(註35)此因《新城王氏世譜》中以其為象春獨子。惟此子在兵變發生時年僅約十一歲，應不太可能「怒投其父名帖」。查象春在《庚戌科序齒錄》中所留下的資料，他於萬曆三十八年（1610）中進士時有一子名與文（見圖二），據世譜中的記載，與文是象春堂兄象艮之子。因疑象春初或因乏嗣而過繼與文，但在中年得子後，又將與文歸宗。亦即，該怒投象春名帖的應最可能是與文。(註36)

33. 沈徵佳，《江東志》，卷8，頁12；鄒漪，《啟禎野乘一集》（《四庫禁燬書叢刊》景印順治十七年刊本），卷11，頁3；查繼佐，《罪惟錄》（《續修四庫全書》景印手稿本），列傳，卷11下，頁82；王家彥，《王忠端公文集》（《四庫禁燬書叢刊》景印順治十六年刊本），卷2，頁36；馬世奇，《澹寧居文集》（《四庫禁燬書叢刊》景印乾隆二十一年刊本），卷1，頁30；張岱，《石匱書後集》（《四庫禁燬書叢刊》景印清鈔本），卷35，頁6；《明清史料》（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1999），甲編，第8本，頁744。

34. 此見張廷玉等，《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35，頁10。又，光緒《增修登州府志》中亦有類似敘述（卷13，頁11）。

35. 何成，《新城王氏：對明清時期山東科舉望族的個案研究》（濟南：山東大學歷史學院博士論文，2002），頁33。

36. 參見《明代登科錄彙編》（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9），頁11898；張世偉，《張異度先生自廣齋集》（《四庫禁燬書叢刊》景印崇禎十一年刊本），卷11，頁9；錢謙益，《牧齋初學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四部叢刊初編》景印崇禎十六年刊本），卷66，頁5；王兆弘等纂修，《新城王氏世譜》（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7，《山東文獻集成（第二輯）》，景印乾隆二十五年刊本），卷4，頁29、55-56。

文獻中有稱吳橋「閉城罷市」一事根本是由縣令畢自寅主導，^(註 37) 此因當時軍紀普遍不堪，^(註 38) 駐登之遼丁更被抨擊常「剽婦女以為嬉」。^(註 39) 此外，自寅之舉還可能受到其親族的特別影響，因其兄戶部尚書畢自嚴嘗為遼事而對孫元化「素不快」，且其同母弟自肅於崇禎元年發生的寧遠兵變中引咎自經，當時索餉的亂兵曾將擔任遼東巡撫的自肅縛綁捶擊至血流被面，而畢家甫於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將自肅安葬，可以想像自寅對以遼人為主的孔有德部應無太大好感。^(註 40)

再加上與增援部隊發生摩擦的新城王家，恰與淄川畢氏世為姻親，查象春同一祖父的十八名堂兄弟當中，即有象乾、象賁、象震、象艮四人配畢氏之女，象豐之女亦嫁畢氏，^(註 41) 兩家關係有謂是「姻婭重重，雖云二姓，無異一宗」，^(註 42) 或使自寅默許甚至鼓動百姓對該軍採取不友善的舉措。^(註 43)

至於該奪雞之兵之所以受到穿箭貫耳的重懲，則主要是因其所得罪的王家「勢凌東省」。查新城王家第三世的王麟共生八子，其中長子耿光與次子重光兩房的科名最盛，在此兩房連續三世的四十六名男丁當中，共出過十四個進士（含一位武進士），而象字輩更囊括十個（參見圖二）！^(註 44) 當事人王象春在兵變前甫以南京吏部考功司郎中告歸，其從兄象乾亦曾兩任兵部尚書（於崇禎二年十月告老回籍，三年五月病卒）；即使在象春同父的兄弟當中，亦有多人出任重要官員，如象恆歷官至應天巡撫、象復為保定府同知、象鼎為吏部考功司郎中、象豐為參將。無怪乎，明人陳繼儒嘗稱：「今海內推喬木世家，首屈新城王氏，名公卿累累，項背

37. 程其珏修，楊震福等纂，《嘉定縣志》（上海：上海書店，1991，《中國地方志集成》景印光緒八年刊本），卷 16，頁 33；梁蒲貴、吳康壽修，朱延射、潘履祥纂，《寶山縣志》（上海：上海書店，2002，《中國地方志集成》景印光緒八年刊本），卷 9，頁 9；沈徵佺，《江東志》，卷 10，頁 16。

38. 如戶部尚書畢自嚴為其弟自肅所撰之行狀中即嘗稱：「徵兵絡繹，所至縱恣，閭門多晝閉，兵至無所得食，益肆掠。」此行狀未見於《四庫全書》文淵閣本之畢自嚴《石隱園藏稿》，惟該書之文津閣本則有。參見楊訥、李曉明編，《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遺：據文津閣四庫全書補》（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集部，第 7 冊，頁 7。

39. 馬世奇，《澹寧居文集》，卷 1，頁 31。

40. 此段參見楊訥、李曉明編，《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遺》，集部，第 7 冊，頁 25；沈徵佺，《江東志》，卷 8，頁 12；汪楫等，《崇禎長編》，卷 11，頁 21。

41. 參見王兆弘等纂修，《新城王氏世譜》，卷 1，頁 7-17；何成，《新城王氏》，頁 85-86、89。

42. 兩家在「象」字輩之後依然頗多互結姻親之例。參見于瑞桓、何成，〈明末清初新城王氏婚姻簡論〉，《煙台大學學報（哲社版）》，15.2（煙台：2002），頁 225-230。

43. 查繼佐誤以吳橋縣令畢自寅在兵變中被殺，其實，自寅於崇禎五年還改調宛平縣令。參見倪昌燮等修、施崇禮等纂，《吳橋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9，《中國地方志叢書》景印光緒元年刊本），卷 6，頁 15；查繼佐，《罪惟錄》，列傳，卷 12 下，頁 17。

44. 王兆弘等纂修，《新城王氏世譜》，卷 1，頁 3-17。

查穿箭貫耳之刑，應至少可追溯至春秋時期。^(註 47)明代名將戚繼光（1528-1588）在《練兵實紀》中，亦強調：「申軍紀：平時恃強凌弱，酗酒忿爭，喧譁無禮，蹂取人果稼，作踐人廬器，分別輕重，治之貫耳遊營。」^(註 48)前述這支部隊因不滿奪雞之部卒受到「貫耳遊營」等重懲，加上對出關之後的命運又徬徨未卜，^(註 49)遂在吳橋譁變，並逼帶隊的孔有德等官員一同起事。

由於叛軍的家口皆在登州，因而回戈東指，聲稱眾人即將出關「前聞赴死」，卻「行糧已盡，市買無所」，還不如「回登請糧，再圖進止」，遂大肆劫掠途經的濟南府各縣。^(註 50)因吳橋之變乃王象春家人所激起，故王氏家族根據地的新城遭焚殺尤慘，王象復及其子與夔均死於城破之時；象春雖僥倖逃脫，但翌年在經理象復父子喪事後，旋以感傷過度而於十二月病卒。^(註 51)然在其進士同年錢謙益所撰之墓誌銘中，卻只稱他於天啟五年（1625）在南京吏部考功郎中任內被削籍後，「一斥不復，而無何遂病且死矣」，完全未提及吳橋兵變及其衝擊，^(註 52)此明顯是「為親者諱」。

其時山東地區分設兩巡撫：登萊巡撫為孫元化，下轄登州、萊州、青州以及遼東沿海諸島，其析設的主要目的在「控制邊海」，防備金軍從海路南下；山東巡撫為余大成，轄山東布政司所屬其他地區。^(註 53)其中登萊巡撫所在的登州，原本僻處海隅，但自天啟年間遼土泰半淪亡後，因毛文龍收拾遼眾，在沿海諸島自成一軍，而歲餉八十萬兩，都是從登州運抵皮島的，再加上關外的參、貂等特產亦多從

47. 此刑應即漢代許慎（c. 58-147）在《說文解字》中所釋之「聃（音同撤）」，其意為：「軍法，以矢貫耳也，從耳、從矢。」查楚成王三十九年（633 BC），子玉奉命練兵，一日之內即曾「鞭七人、貫三人耳」。參見許慎撰，徐鉉增釋，《說文解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12 上，頁 8；杜預注，林堯叟補注，王道焜、趙如源輯，《左傳杜林合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13，頁 2。

48. 戚繼光，《練兵實紀》（《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2，頁 16-17。

49. 文秉在《烈皇小識》中有云：「遼丁貪淫強悍，登人不能堪。適是冬有大凌河之警，孫（元化）令孔有德等率遼丁往援，即于原籍着伍，亦兩全之術也。」（卷 2，頁 38-39）

50. 汪楫等，《崇禎長編》，卷 53，頁 33-34；談遷，《國榷》，卷 91，頁 5577。

51. 崔懋修、嚴濂曾纂，《新城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中國方志叢書》景印康熙三十三年刊本），卷 11，頁 18-19；查繼佐，《罪惟錄》，列傳，卷 12 下，頁 21；張世偉，《張異度先生自廣齋集》，卷 11，頁 10-11。

52. 錢謙益，《牧齋初學集》，卷 66，頁 4。

53. 靳潤成，《明朝總督巡撫轄區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頁 67-72；嚴有禧纂修，《萊州府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中國地方志集成》景印乾隆五年刊本），卷 13，頁 111。

海路透過登州轉售內地，遂造成商旅雲集的富饒局面。（註 54）

由於孫元化、余大成兩巡撫均欲以招安的方式解決此事，而叛軍又佯應之，孫元化於是通令各郡縣不得攔截，且致書余大成曰：「撫局已就，我兵不得往東一步，以致壞事。」叛軍遂在行經青州、萊州時停止搶掠，並於二十二日長驅返抵登州。（註 55）此一行軍速度較去程快了一倍有餘，沿途且還曾費時攻城掠地，因知孔有德先前的確有意拖延開赴前線的時間。

吳橋之變的發生，提供黃龍一絕佳之藉口，以辯解自己先前遭部下縛綁的窘事。他於五年正月初一日上疏，謂四年四月他在登州所派差官王舜臣和李梅的兩艘船上，搜出違禁的黃蟒和胡絲等物，價值約兩萬兩，而其背後之物主則為孫元化屬下的撫標中軍王廷臣（舜臣之弟）和撫標遊擊耿仲明（?-1649；李梅為其心腹）。黃龍稱已當即將船貨沒收，本擬於稍後將相關人等審明正法，不料在廷臣和仲明的指使之下，時任皮島都司的耿仲裕（仲明胞弟），於十月二十七日鼓動其本營兵丁以索餉為名包圍黃龍的公署，除將兵器、文卷、書籍、衣服席捲一空外，還將黃龍擁至演武場，欲對其不利，「賴眾將理論而散」。次日，仲裕更陰令其黨將原被沒充的船隻連同蟒緞和胡絲等貨物駛離皮島。惟仲裕因擔心事情曝光，遂與千總王應元謀為亂，欲殺諸將領並降金，但兵士不從，乃縛應元出首。十一月二十六日，沈世魁與尚可喜等將領分兵擒獲仲裕及其同謀，黃龍於是將耿仲裕及王應元等人正法，且疏請查明王廷臣、王舜臣、耿仲明和李梅等人的罪狀。（註 56）

黃龍此一辯白與前文其他文獻中的敘事頗異，由於朝鮮史料以及先前曾提拔他的孫元化均指其貪墨剋餉，兵士亦控訴他搜括銀錢肥己，並逼迫眾人餓著肚子上山挖參，（註 57）故筆者頗疑黃龍沒收王舜臣和李梅船貨的動機，很可能涉及雙方的利益衝突，（註 58）而耿仲裕之所以牽涉其中，或是替其兄的心腹李梅討回「公道」。此外，黃龍在復出視事的一個多月後，始疏奏變亂的緣由和過程，亦頗耐人

54. 汪楫等，《崇禎長編》，卷 55，頁 3。

55. 毛鷲，《平叛記》，頁 2、4；張世偉，《張異度先生自廣齋集》，卷 12，頁 23。

56. 汪楫等，《崇禎長編》，卷 55，頁 1-2；畢自嚴，《度支奏議》（《續修四庫全書》景印崇禎間刊本），新餉司，卷 34，頁 67。

57. 春秋館編，《朝鮮仁祖大王實錄》，卷 25，頁 39；張世偉，《張異度先生自廣齋集》，卷 12，頁 22-23；《明檔》（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第 186 號卷，第 9 號，轉引自孫文良、李治亭、邱蓮梅，《明清戰爭史略》（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6），頁 329。

58. 如兵部尚書楊嗣昌於崇禎十一年嘗疏稱：「耿仲明者，該撫孫元化之中軍也。黃蟒、湖絲，黃龍所執，以為仲明透販之物，而並以持元化之短長者也。鎮（筆者按：指黃龍）主販而欲專之，撫（指孫元化）分權而旋噬之。」參見楊嗣昌，《楊文弱先生集》（《續修四庫全書》景印清初刊本），卷 24，頁 2。

尋味，他很可能是利用吳橋之變的混亂，以推託應負的責任，且為維護顏面，他在疏中亦絕口不提自己曾遭拷打重傷一事。

孔有德叛軍返抵登州城外後，就於城南的密神山紮營，不僅未積極接受招安，且開始部署攻城。當時城內「鳥銃、鎗刀皆西洋，藥法、彈法皆西洋，又即以西洋人放之」、「有西洋大砲十餘位，西洋鳥銃併自造大砲數十，又用取西洋人合藥、裝放」，（註 59）守軍則主要包括原籍關外的遼兵以及來自南方的南兵，分由標將張燾和總兵張可大率領。五年正月初二日，兩軍戰於城東，初南兵略勝，但遼兵突然引退，南兵幾遭殺傷殆盡，而張燾的部下亦半降敵。初三日，降敵的燾兵復詐來歸，孫元化許之，叛軍遂混入城中，並與耿仲明等遼將密謀內應；是夜，有德即從東門殺入陷城。黃龍與耿仲明兄弟間先前的瓜葛，或許也是仲明決定臨陣倒戈的重要因素。城破之時，孫元化引刀自刎未遂，乃與登州道宋光蘭、監軍道王徽、標將張燾等官員同被俘，張可大則自縊殉國。當時城中尚有舊兵六千人、援兵一千人、馬三千匹、餉銀十萬兩、紅夷大砲二十餘位、西洋砲三百位等大量人員物資，俱為叛軍所有。（註 60）畢自嚴因此感慨曰：「登鎮以全齊物力數年布置，甲仗、火攻之需，無一不備，而叛兵孔有德等全據為助逆之具。」（註 61）

在登州遭孔有德圍攻時，公沙等來自澳門的軍事顧問亦在城內協助防守，城陷時有十二人捐軀。死難的統領公沙被明廷追贈為參將，副統領魯未略（*Laurent de Lis Veglio*）贈遊擊，銃師拂朗·亞蘭達（*Francisco Aranda*）贈守備，另九位僉伴則贈把總職銜，並各給其家屬賞銀十兩。從崇禎三年正月初抵京至五年正月的登州保衛戰，這批總數共三十三人的澳門放砲教師，為明朝效力前後逾兩年。他們在北京演砲練兵，並投入己巳之役和東江保衛戰，可謂盡職盡責。這群澳人當中超過三分之一為明朝戰死沙場，但諷刺的是，其忠誠度卻曾飽受質疑，且死於受過他們訓練的叛軍之手！（註 62）

登州之陷有部分肇因於山東人與遼東人之間日益嚴重的磨擦（附錄），此故，當叛軍回攻登州時，即有稱「登人故虐遼人，至兵臨城，猶殺遼人不止」，或謂「村屯激殺遼人於外，外黨愈繁；登城激殺遼人於內，內變忽作」；而當叛軍陷登之後，報復亦起，「凡遼人在城者，悉授以兵，共屠登民甚慘」，且有稱「（遼

59. 范景文，《戰守全書》（《四庫禁燬書叢刊》景印崇禎間刊本），卷 10，頁 50、卷 12，頁 29。

60. 范景文稱當時城內有「西洋大砲八門」，此或指的是規制較大者。參見毛鷲，《平叛記》，頁 5；范景文，《戰守全書》，卷 12，頁 29。

61. 畢自嚴，《度支奏議》，新餉司，卷 28，頁 69。

62. 此段參見董少新、黃一農，〈崇禎年間招募葡兵新考〉。

兵)向之畏敵如虎,今則視內地之人,則彼又不啻虎矣,殘忍更過之。一時東人厄運、殺運,筆難盡書」,益知其時山東人與遼東人之間的確存在相當嚴重的省籍情結。(註63)

時人嘗歸納吳橋兵變的原因為:「孔、李梟獍素習,一反也;為登土人凌蔑積恨,二反也;不願遠戍寧遠,三反也。」(註64)其中「不願遠戍寧遠」一事,則與明廷欲「裁撫撤兵」的作法攸關,此舉亦獲登萊巡撫孫元化的支持,因孫氏認為登萊的海防可歸山東巡撫,至於恢復遼東四衛的任務,則可歸遼東巡撫,故主張應將素無牽制之效且屢屢釀亂的東江部隊改調關外。(註65)當時左春坊左諭德陳仁錫嘗云:

登之遼人與始為亂之遼人猶有限也,海外之遼人無限也;登之遼人猶有妻子也,治亂之遼人已為飽鷹也。海外之遼人窮而悍,與虜同性,勾聯入登,其勢愈張,難破矣……遼人有二等,有南四衛之遼人,有北四衛之遼人,今之賊,北四衛之遼人也,性與虜同……自三韓淪沒,遼人進關百萬餘,輜重十倍之,遼俗不耐饑渴,流離傷心,所在有爭,爭則人欺其孤,且利其有,不曰養患可虞,則曰通夷有據,株連吹求,因一人而斃數十命,一事而疑千百人,十年來摧折殆盡,富者罹法,貧者投奴。(註66)

文中對大量入關遼人的悲淒處境,有相當深刻的描述,但也呈現出對這些難民的嚴重偏見,甚至認為他們是非我族類,「性與虜同」。

兵變首腦李九成、孔有德和耿仲明三人,原均為毛文龍部下,文龍待三人甚厚,命李、孔典內兵,耿主錢帛,並均易姓為毛:李九成改名有功,崇禎二年,已為副將;孔有德改名永詩,耿仲明改名有傑,同在崇禎元年為參將。(註67)三人

63. 此段參見張世偉,《張異度先生自廣齋集》,卷12,頁23;畢自嚴,《度支奏議》,雲南司,卷15,頁6;汪楫等,《崇禎長編》,卷55,頁3;王徵,《王徵遺著》,頁150。

64. 艾容,《微塵閣稿》(日本內閣文庫藏崇禎七年序刊本),書,卷13,頁30。

65. 沈徵佺,《江東志》,卷8,頁10-11;卷10,頁16。

66. 陳仁錫,《無夢園初集》(《續修四庫全書》景印崇禎六年刊本),海集一,頁39-40;漫集二,頁93-94。

67. 周文郁,《邊事小紀》(臺北:正中書局,1985,《玄覽堂叢書續集》景印崇禎間刊本),卷3,頁14;吳騫輯,賈乃謙點校,《東江遺事》(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頁153-154;毛承斗輯,賈乃謙點校,《東江疏揭塘報節抄》(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頁60、62、

在文龍死後改回原姓且投奔登撫，但或因先前毛文龍所授之官銜並非正式編制，故李九成反降為參將，孔、耿二人則降為遊擊。

孔兵攻陷登州以後，朝野對相關官員的抨擊四起：郭之奇詩中有「乍傳七邑趨風潰，疑說專戎伏地迎」句，責孫元化按兵不動，甘願被俘；（註 68）貴州道試御史丘民仰疏參孫元化和余大成「認賊作子，坐聽其劫庫殺官，連破數城，如摧枯折腐之易……元化孑身而奔，損威辱國，乃匿不以聞」；戶科給事中朱國棟亦劾孫、余兩人「玩寇殃民，悠悠坐視，僅知兩相諉卸」；登州生員吳化鵬、吳化鴻則具揭稱「元化心懷異志，顯與賊通，同謀不軌。見今僭號順天，稱王東鎮」。（註 69）

於是眾臣有主張將孫元化的家屬囚繫者，且砲火延及首輔周延儒（孫元化的鄉試同年）（註 70）和兵部尚書熊明遇，如陝西道試御史余應桂指稱諸臣先前屢糾元化貪汙欺詐，但均因周延儒迴護，終有吳橋之變，故「主登兵之叛逆者，非孔有德，乃孫元化也。成有德之叛逆者，非孫元化，乃周延儒也」，而兵科給事中李夢辰也藉此一兵變抨擊熊明遇「調度失宜，威望既不足以服人，才幹亦不足以濟變，難以久居司馬之堂」；雖然崇禎皇帝仍溫旨慰留周、熊二人，但已埋下他們未幾即去職的引子。（註 71）

徐光啟則上疏為其同教門生孫元化申辯，並稱如其有造反之意，「臣願以全家百口共戮」。（註 72）事實上，孫元化的甥婿潘雲柱在五年正月聞元化因兵敗而遭削籍聽勘時，似曾擬豎反旗，但為元化所阻。（註 73）而叛軍欲擁立孫元化之事，亦見於十七世紀的歐文著述中，如耶穌會士 Daniello Bartoli（1608-1685）在其《中國耶穌會史》（*Dell' historia della Compagnia di Giesu la Cina*）（1663）中，即嘗曰：

叛軍曾願擁立（孫元化）為王，彼以此舉不忠於天主、不忠於皇上，毅然拒絕……元化願負譁變之咎，偕張燾、王徵入京。眾以此行必罹巨禍，勸易清幟。三人以忠天主之心忠君，卒奉命去。元化與燾皆論死，

90、94、101、127、133；春秋館編，《朝鮮仁祖大王實錄》，卷 19，頁 53。

68. 郭之奇，《宛在堂文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四庫未收書輯刊》景印崇禎間刊本），卷 11，頁 5。

69. 汪楫等，《崇禎長編》，卷 55，頁 11 及 13、卷 56，頁 12。

70. 趙弘恩等修，黃之雋等纂，《江南通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130，頁 8。

71. 汪楫等，《崇禎長編》，卷 56，頁 12-19。

72. 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 1623-1693），〈徐光啟行略〉，收入張星曜編，《通鑑紀事本末補·附編》（巴黎：法國國家圖書館藏鈔本）。

73. 沈徵佺，《江東志》，卷 10，頁 17。

徵削職，並籍沒家產。

此外，耶穌會士 Père Pierre Joseph d'Orléans (1641-1698) 所撰《兩位征服中國之韃靼皇帝的歷史 (*Histoire des deux conquérants Tartares qui ont subjugué la Chine*) 》(1688) 中亦稱：「變後，(所部) 知公必膺懲處，且不可救，遂以叛國為勸……清軍聞其事，亦遣人相告曰：『降則必獲安全』，將軍處誘惑中，不為動，竟論死。」惟其所稱金人當時曾向孫元化誘降之說，並不見於中國文獻，待考。(註74)

孔有德在陷登之後，嘗請被俘的孫元化移書余大成請求招安，余氏遂建請兵部尚書熊明遇續採撫議，明遇乃遣遼東籍的職方主事張國臣入賊營招諭，國臣於是傳令「毋出兵壞撫局」，但「賊佯許之，攻圍如故」。山東巡按御史王道純則自始主張速剿，及登州淪陷，元化被俘，大成猶主張招撫，道純於是抗疏力爭，帝遂命道純監軍。叛軍曾遣人偽乞撫，道純焚書斬使，並上疏言：「賊日以撫愚我，一撫而六城陷，再撫而登州亡，三撫而黃縣失，今四撫而萊州被圍。我軍屢挫，安能復戰？乞速發大軍，拯此危土。」卻遭切責，由此可知當時朝中的當事者多主張招撫。(註75)

事實上，叛軍並無誠意被招安，反而繼續攻城掠地。崇禎五年二月，新任的山東巡撫徐從治和登萊巡撫謝璉即曾在疏中強調：「若『撫』之一字，是賊之所以愚弄孫元化於股掌之上者，而可再入其彀中耶？」，且謂：「國臣以撫為叛兵解嘲，而叛兵即借撫以為緩兵急攻之計。」(註76)

由於孫元化對遼人素來頗為照顧，且叛軍為尋求招撫的可能，孔有德遂用耿仲明的建議，於五年二月將孫元化、宋光蘭、王徵、張燾等人放還。王徵在放歸後，曾具疏論及登州城陷前後的情形，中稱：

初三之夜，內潰外應而城破矣！叛將不肯加害，且令兵士衛守。少刻，則孫撫臺乘馬而至，見城已破，輒自刎僕地。叛兵細搜徵身，恐亦自刎，防範愈嚴。(註77)

74. 兩書均轉引自方豪，《中外文化交流史論叢第一輯》（重慶：獨立出版社，1944），頁226-227、246。惟方豪誤將 d'Orléans 之書名譯作「韃靼人兩次征服中國記」。

75. 張廷玉等，《明史》，卷248，頁6432-6433；卷264，頁6828-6829。

76. 毛騫，《平叛記》，頁19、27。

77. 王徵著，李之勤輯，《王徵遺著》，頁150-151。

指稱孫元化在城破時曾自刎未遂，（註 78）惟或因此舉違背天主教不能自殺的誠律，故教會中人對類似行為多避而不言。（註 79）

三、兵變的蔓延與平息

叛軍在攻陷登州後，開始部署營伍、偽授官爵，並鑄「都元帥」印，（註 80）推原官階較高的李九成（參將）為首、孔有德（遊擊）為副，耿仲明（遊擊）則自稱都督。此因在吳橋初叛之時，是由李九成和李應元（千總）父子劫有德而叛，且返登沿途攻破六城時，皆以九成為前驅，故有德雖為叛軍的直屬帶兵官，但卻以「九成父子材武，且有首事之勳」而讓先。（註 81）李九成外號「三大王」，尤長於鳥銃，「可擇人命中」，時人有稱：「雖孔有德肇亂於吳橋，而造謀桀驁，為眾逆之所推戴者，李九成實居孔有德之右，故其挺身率賊，抗我王師，兇惡至極。」（註 82）知李九成初確為叛軍之首腦。

較晚成書的清代文獻則多稱當時乃以孔有德為都元帥、李九成為副元帥，且指孔有德和耿仲明叛變時原均任參將，此或因九成早死，且孔、耿二人在降清之後飛黃騰達，而遭阿諛者蓄意竄改所致。（註 83）另一方面，在康熙《新城縣志》中，則因叛軍陷城時曾殺戮甚慘，故編纂者只稱兵變的帶頭者是「李九成等」，而未敢言及孔、耿。（註 84）

叛軍曾將搜刮的財物撥出萬金來犒賞遼東沿海諸島，誘令同反。此一策略相當成功，如遼東半島沿岸的鹿島、石城島等地的兵民均叛，但旋遭鎮守在皮島的黃龍

78. 傳說崇禎帝後曾派人量孫元化頸間刎痕，得「深二寸許」；參見張世偉，《張異度先生自廣齋集》，卷 12，頁 23。

79. 黃一農，《兩頭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頁 78、154-155、169、221、468。

80. 查明朝當時並無「都元帥」之稱謂，此一命名或與孔有德等人先前在東江的經驗有關，因朝鮮自薩爾滸之役起即設都元帥和副元帥，「受命專征」，以因應金國崛起後邊境許多突發之軍情。參見春秋館編，《光海君日記》（漢城：探求堂，1981，《朝鮮王朝實錄》本），卷 129，頁 46-48；卷 130，頁 196。

81. 參見毛鷲，《平叛記》，頁 1、5-6；汪楫等，《崇禎長編》，卷 55，頁 1-4。

82.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等編，《中國明朝檔案總匯》，第 81 冊，頁 28；《明清史料》，甲編，第 8 本，頁 742、744。

83. 《清太宗實錄》，卷 14，頁 190-191；鄂爾泰等修，李洵、趙德貴等標點，《八旗通志初集》（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85），卷 175，頁 4236；卷 178，頁 4287-4288。

84. 崔懋修、嚴濂曾纂，《新城縣志》，卷 8，頁 22；卷 11，頁 18。

救平。由於黃龍原住登州的家人均在城破時被殺或被俘，孔有德遂遣石盡忠假持黃妻劉氏的金簪為信物，欲說降已攻抵長山島的黃龍，但黃龍不受威脅，力殲叛黨，並直趨旅順。（註 85）在黃龍的圍剿之下，欲叛離的島眾紛紛渡海至登州，其中即包括毛文龍諸義子之首的廣鹿島副將毛承祿；而陣容最浩大者，則是旅順將領陳有時（先前名毛有侯）所率領的七、八千人，有稱初叛於吳橋的兵士原即多為陳有時的部下，孔有德因此應允在攻破萊州後，所得盡歸其眾。（註 86）

山東巡撫余大成聞登州已失，卻束手無策，唯閉戶修齋誦經，被人譏之為「白蓮都院」。（註 87）崇禎五年（1632）正月十三日，叛兵破黃縣。余大成遭革職，尋遭逮治。二十九日，總兵楊御蕃率通州等兵、王洪率天津兵與叛軍在掖縣八十里外的新城鎮接戰，當時叛軍有騎兵五千名、步卒萬餘，明軍只有騎兵不足一千、步卒不足四千，結果王營未戰先潰，叛軍且取其火器以攻楊軍。明軍最後星散四潰，僅御蕃率親軍三百人退抵萊州。（註 88）

五年二月初一日，徐從治和謝璉兩撫俱抵萊州。初三日，叛軍至，在城四周紮營十多處，開始長期的圍城戰，守城的兵丁總數共約四千名。（註 89）三月二十七日，兵部侍郎劉宇烈以督理的身分誓師向萊州進發，共調集薊門、密雲等地的援兵和義勇鄉兵，凡馬步兵二萬五千人；四月初二日，崇禎帝還特遣中使送紅夷大砲六門至沙河交付援軍。但因劉等統帥均不諳兵事，人馬雜揉，紀律不明，又不分犄角，且輜重亦遭敵焚燬，終在沙河兵潰，被擄者無算，大砲等大量火器反為叛軍所有，巡撫徐從治亦於十六日中砲死。（註 90）

四月二十九日，萊州府推官屈宜揚自入叛軍寨中講撫，屈氏此舉或得到劉宇烈的默許，劉氏於五月十六日還為此事具本題撫，但戶部尚書畢自嚴、戶部右侍郎劉重慶、四川道御史王萬象等人均上疏力排撫議，或稱：「孫元化乃以甘言陷賊，借名激變，特倡一撫之說……猶甘心囚首詭計入都，欲始終用撫之一著，以緩須臾之死。」或稱：「非逆賊欲撫，乃敗事之孫元化欲撫也；亦不獨孫元化欲撫，乃左右護庇元化者之皆欲撫也。」（註 91）前述的畢、劉、王等官員均為山東籍，其主剿

85. 沈演，《止止齋集》（日本尊經閣文庫藏崇禎六年刊本），卷 33，頁 27-32。

86. 此段參見毛鷲，《平叛記》，頁 6、13-14、23；汪楫等，《崇禎長編》，卷 55，頁 2-4；補過居士，《東事紀略》（《山東文獻集成（第二輯）》景印清鈔本），頁 1。

87. 汪楫等，《崇禎長編》，卷 55，頁 12。

88. 毛鷲，《平叛記》，頁 6-12；汪楫等，《崇禎長編》，卷 55，頁 31。

89. 毛鷲，《平叛記》，頁 9-25。

90. 同前引，頁 28-31。

91. 同前引，頁 40-43。

的重要原因應均是痛心鄉里遭叛軍荼毒至慘。

五月初八日，原天津兵備道朱大典奉命巡撫山東，駐青州調度。由於先後參與勦賊的大將已有天津總兵王洪、保定總兵劉國柱、通州總兵楊御蕃、薊門總兵鄧玘、登州總兵吳安邦、昌平總兵陳洪範、東江總兵黃龍以及義勇總兵劉澤清，但均無能奏功，且叛軍嘗私語曰：「殺山東兵如刈菜，無奈我何！各鎮兵咸非吾敵，惟慮關外兵耳。」劉重慶以及王萬象乃於六月初五日同時疏請調派關外的精銳入援。（註 92）初九日，諭旨乃調山海關及寧遠等地的夷、漢精銳四千八百餘人入關，由太監高起潛監護軍餉，總兵金國奇為帥，下轄靳國臣、祖大弼、祖寬、張韜、吳襄、吳三桂（1612-1678）等名將。其中由投誠的滿洲等少數民族所組成的夷丁部隊，是首度深入內地，其戰鬥力特強。叛軍或聽聞此一新發展，乃經由屈宜揚表示願受撫，劉宇烈在將此一情形上奏後，奉旨一方面「勵集援師，亟解萊圍」，另一方面，如叛軍確實真心輸誠，應命其提出自贖之道，劉氏遂令孔有德立解萊城之圍以示誠意。（註 93）

七月初二日，叛軍聲言撫事已成，兩軍不必放砲，為取得官軍的信任，孔有德還將一名試砲的部下割耳遊營。初五日，劉宇烈差官齎聖旨至孔營，有德要求面見謝璉始定解圍和開讀聖旨之期。初七日，在萊州城外宣旨之後，朱萬年竟遭誘殺，謝璉亦被執。初十日，東撫朱大典和新任之山東巡按謝三賓奉命速赴行間督諸將進剿。二十二日，叛將陳有時在攻平度時被殺。二十三日，震怒之崇禎帝將孫元化和張燾棄市，宋光蘭以及王徵遣戍，熊明遇則解任聽勘，並且派人拿解劉宇烈至京究問。（註 94）

王徵由於在兵變發生前數月始到任，再加上其友人刑部山東司員外郎來于廷的加意護持，遂僅獲謫戍的處分，稍後更遇赦還家。（註 95）王徵在詔獄中曾請孫元化於臨刑前手書墨跡一幅作為訣別紀念，元化當時屢遭嚴刑，「手受刑五次，加掠二百餘」，但仍在「酸楚搖顫，間一舉筆，橫直宛轉，起止之間，皆不自繇」的情形下，舉筆記交誼始末時，自稱兩人初識的前七、八年，因同為天主教徒且有耶穌會士從中引介，故彼此「道義相許」，惟因見面極少，乃維持一種「淡若水」的君

92. 同前引，頁 38、45-47、61。

93. 同前引，頁 48-49。參與勦賊的總兵資料，亦見此書各頁。

94. 同前引，頁 52-58；《崇禎長編》，卷 61，頁 24；謝斯茂，《圍城接入書揭》（韓國首爾大學奎章閣藏崇禎間刊本），頁 21-22。有關謝書之討論與介紹，參見黃一農，〈奎章閣明清軍事史重要文獻過眼錄〉，頁 235-237。

95. 黃一農，《兩頭蛇》，頁 149。

子之交。崇禎四年二月，元化推薦服喪期滿的王徵擔任遼海監軍道，孫氏在此手卷中指稱：「翁才望高出一時，長安以勢要相許者，不亞於余之道義，而余不顧勢要之足奪與否，毅然請之，亦心知翁之自必不以勢要奪也。」知同教的情誼應是乙榜出身的元化得以說服長他十歲之進士王徵出任監軍的重要因素。元化並請張燾將被叛軍放歸且同赴京請罪者的姓名、字號、籍貫和官銜亦書於末。（註 96）由徐光啟等天主教徒所進行的一連串軍事努力，卻在這幅字完成後不久煙消雲散。

文獻中有稱孫元化和張燾死前，耶穌會士湯若望（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曾喬裝成送炭工人至獄中為其行赦罪禮。（註 97）並稱兩人在西市（明代刑場，在今北京西四牌樓）臨刑之際，北京出現「風雷起足下，黃霾翳日」的異象，徐光啟因此對主張論大辟的首輔溫體仁稱：「此足明登撫真冤矣！」（註 98）查處決前一天，北京確曾發生地震，但規模應不大，（註 99）由於時間並不在臨刑當日，該說顯然有附會的成分。

後人也有曲改史實以為「賢者諱」的情形，如清代方志中有稱孫元化「於遼陽抗大兵殉節」，並在記王徵的生平時，完全略過他監軍時所發生的吳橋兵變；又，孫致彌（1642-1709；元化之孫）的友人劉獻廷也稱張燾是在「壬申七月二十三日，登州失陷殉難」，刻意營造其殉國的形象。（註 100）惟時論對孫元化大多不表同情，（註 101）如吏部考功郎中徐石麒在致友人的信中即云：

96. 徐景賢，〈明孫火東先生致王葵心先生手書考釋〉，《聖教雜誌》，20.9（上海：1931），頁 531-538；21.5（上海：1932），頁 269-277。

97. Alfons Vāth,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S. J., *Missionar in China, Kaiserlicher Astronom und Ratgeber am Hofe von Peking, 1592-1666* (Cologne: J. P. Bachem, 1933), p. 98；魏特（Alfons Vāth）著、楊丙辰譯，《湯若望傳》（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0），頁 142。

98. 程其珏修、楊震福等纂，《嘉定縣志》，卷 16，頁 34。

99. 此因《明史·五行志》並未記此地震，且人在北京的祁彪佳亦稱：「時地震，余不知也。」參見張廷玉等，《明史》，卷 30，頁 504；祁彪佳，《祁彪佳文稿》（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第 2 冊，頁 969。

100. 應寶時修、俞樾纂，《上海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9，《中國方志叢書》景印同治十一年刊本），卷 23，頁 10；劉懋官修、周斯憶纂，《涇陽縣志》（《中國方志叢書》景印宣統三年鉛字本），卷 13，頁 17；劉獻廷，《廣陽雜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67，《百部叢書集成》景印光緒間刊本），卷 4，頁 11。

101. 方豪在引述祁彪佳日記《棲北冗言》時，或誤解原文之意，稱：「所謂宣撫有周旋之者及託阻止華鳳超之疏，均可證當時知元化受誣，而欲營救者，實不乏人。」其實，祁氏乃指先前有欲替宣撫沈榮脫罪（因其私自與入侵的後金議和而下獄）者反受皇帝切責，而非指沈榮替元化辯誣。又，祁氏託人阻止華允誠（號鳳超）上疏，應亦非為元化之事，而較可能是為救沈榮或攻擊溫體仁。事實上，華氏對元化的評價不高，他曾於崇禎五年六月疏糾溫體仁等亂政，其中即批評不應將「潔己愛民之余大成與孫元化並逮」。參見方豪，〈孫元化手書與王徵交誼始末註

孫火東，深信其肝腸雪白、氣質沉凝、有志有節之士。初聞從亂，百喙爭之。今傳聞想確矣！夫以國家土地人民付之一擲，即粉身莫贖，然猶可曰天限之材也，奈何以堂堂節鉞重臣，甘心屈節於素隸戲下之狗鼠，不知何故喪心至此，殆不可解。（註 102）

知其原本與許多人一樣不信元化從亂，但稍後則態度全然轉變。

崇禎五年八月十三日，朱大典等在昌邑誓師，合二萬一千名馬步兵，分三路進軍。十九日，在距萊城五十里外的沙河發生會戰，叛軍大敗東遯，萊州之圍遂解。是役雖捷，但殺敵不多，惟叛軍撤回登州者亦不及十分之三，其餘均乘機四散逃逸，在當時所擄獲的兵籍簿上列有叛軍共九萬餘人，知此亂的規模實非等閒。（註 103）而遭圍城逾半年的萊州之役成功牽制了叛軍主力，令其無法流竄它處，應是救平吳橋兵變的轉捩點。

吳橋之變過程中雙方所動用的火炮規模，是中國戰場上前所未見的。如崇禎五年正月，總兵楊御蕃與叛軍在新城鎮進行野戰，叛軍即動用了紅夷大砲五門和大將軍三百餘門；而楊軍亦配置有三十餘門大砲，惟其中二十四門竟然膛炸，可知當時許多明軍仍不十分熟悉新式火炮的操作技巧，此一狀況直到五年二月彭有謨率三百名川兵入援後始有改善。彭氏的火砲知識可能源出曾同樣駐守旅順之張燾，（註 104）他首先列出各種火炮所應用硝、黃和灰的比例，次將火藥每斤以紙作一包，避免忙中生錯。由於守城時砲口偶需朝下發射，彭氏還要求砲手在放入砲彈之後，以廢紙或舊絮、舊毯塞緊，如此，便無墜脫之虞。當時萊州庫中仍有萬曆年間收貯的硝黃約數萬斤，但因砲彈每天消耗甚大，知府朱萬年遂於三月下旬開始在城內募集以數千斤計之金屬，最多時有工匠五十多人負責鑄彈，但因鐵不足，有時亦鑄銅彈，通常僅足一日之用。另一方面，雖然石彈不能「透木、及遠」，仍令石工繼續削圓石備用。（註 105）五年二月，叛軍也曾以牛車從登州運紅夷大砲八門至萊州圍城，每門皆重二、三千斤，各用牛四頭；其所用的鐵子（即砲彈）大者如升、

釋》，《真理雜誌》，1.2（重慶：1944），頁 225-228；祁彪佳，《祁彪佳文稿》，第 2 冊，頁 969；張廷玉等，《明史》，卷 257，頁 6631；卷 258，頁 6648-6649。

102. 徐石麒，《可經堂集》（《四庫禁燬書叢刊》景印順治間刊本），卷 7，頁 24。

103. 毛霧，《平叛記》，頁 59-61。

104. 李肯翊，《燃藜室記述》（漢城：景文社，1976 年景印朝鮮古書刊本行會排印本），卷 25，頁 430。

105. 參見毛霧，《平叛記》，頁 11-12、17、24、27；徐從治，《圍城日錄》（《山東文獻集成（第二輯）》景印清鈔本），頁 30-31、39；張忻，《歸園日記》（《山東文獻集成（第二輯）》景印清鈔本），頁 10。徐從治稱當時每日鑄砲彈三千餘個，此數目或太過誇張。

小者如拳，重從六至十二斤不等，（註 106）知各砲的口徑約在十至十二公分間。（註 107）雖然這些砲相當沈重，但叛軍對搬運似遊刃有餘，他們當時應已熟稔西方傳入的省力滑輪技術，此因在登州擔任監軍的王徵，早於天啟七年（1627）出版的《遠西奇器圖說錄最》中，即圖文並茂地詳記舉重物之法。（註 108）

五年八月二十日，李九成聞萊州兵敗後，遂將軟禁於登州的謝璉殺害。三十日，官兵進抵距黃縣二十里的白馬塘，叛軍傾巢來戰，號稱十萬之眾，其中包含馬兵萬騎；是役，叛軍再度慘敗，有一萬三千人被斬，八百人被俘，至於逃散以及墜海而死者，不下數萬。（註 109）

九月初一日，明軍各路俱至登州開始圍城。登州三面環山，北面向海，為避免遭敵夜襲，明軍乃以數日的時間構築一道長達三十里之圍牆，其高如城，東西兩端俱抵海。由陳洪範、劉澤清率步兵守西牆，吳襄、靳國臣等率騎兵接應；劉良佐、鄧玘等率步兵守南牆，金國奇、祖大弼等率騎兵接應；牟文綬等率步兵守東牆，祖寬、張韜等率騎兵接應。由於叛軍擁有二十幾門紅夷大砲，且李九成素負驍健，常出城搏戰，雙方往往以數千馬步軍配合火砲進行大規模野戰，互有勝負。因城上的火砲威力強大，且防守森嚴（如城中衢路不許遼人以外者任意行走，違者斬之；又，每垛夜間均以五人防守，按更輪替，傳箭警睡；不時還縋人至城外夜巡），明軍數次攻城俱無結果，遂決定採行緊守坐困的策略。（註 110）

十二月初三日，李九成率叛兵出戰時歿於陣，改由王子登替代，（註 111）因九成勇謀均甚於孔有德，且叛變過程主要的攻守戰役多由他與陳有時擔任前鋒，素為遼人所推戴，叛軍士氣於是大受打擊。六年正月，高起潛任掛榜山（今蓬萊市城

106. 若以人力運砲，將是很大的負擔，如清代之制即規定：「軍營鑄造砲位、運送砲臺，如道路平坦、易於抬送者，均按五十斤用夫一名；如山路崎嶇險仄處所，砲身千斤以內，仍按五十斤用夫一名；其重在千斤以上者，按十五斤用夫一名。」此應可略見明末的情形。參見毛鷲，《平叛記》，頁 13、19；徐從治，《圍城日錄》，頁 8；張忻，《歸圍日記》，頁 4-5；阿桂、和坤等纂修，《欽定戶部軍需則例》（《續修四庫全書》景印乾隆五十年刊本），卷 5，頁 3-4。

107. 此以鐵的密度為 7.8 g/cm^3 估算，而當時中國所行用的斤約合 597 g。

108. 鄧玉函口授、王徵譯繪，《遠西奇器圖說錄最》（臺北：藝文印書館，1968，《百部叢書集成》景印道光間刊本），卷 3，頁 1-6。

109. 毛鷲，《平叛記》，頁 62-63。

110. 毛鷲，《平叛記》，頁 62-63；《明清史料》，甲編，第 1 本，頁 5；甲編，第 8 本，頁 739-740；汪楫等，《崇禎長編》，卷 63，頁 5；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等編，《中國明朝檔案總匯》，第 83 冊，頁 66。

111. 王子登原為金國參將，後投降毛文龍，因向袁崇煥密告毛氏有反意而陞授副將。參見汪楫等，《崇禎長編》，卷 66，頁 24；陳生璽，《明清易代史獨見》，頁 199-213。

南)新築銃城,並用紅夷大砲轟擊城內,令叛兵膽寒,明廷於是決定自北京再趕運四、五門大砲。由於城中日益乏食,孔有德乃於六年二月十三日乘船自海上遯去,殿後的耿仲明和毛承祿則於十六日潛逃。十八日,官兵攻下水城,叛軍被俘者千餘人,自縊及投海而死者四、五千;至此,始完全收復山東。(註112)

突圍的孔有德仍擁眾數萬人,由於黃龍的能力頗受大家懷疑,甚至屢有人建議應「易帥」,廷議遂決定另派周文郁以副總兵署鎮事,並率舟師追擊叛軍,黃龍則坐鎮旅順。(註113)旅順位於遼東半島南端沿岸,是控扼登、津與東江之要衝,自陳有時叛離後,黃龍即移鎮駐此。六年二月二十二日,孔有德圍襲旅順,遭黃龍以西洋砲痛擊,並計擒毛承祿正法。(註114)孔有德原本希冀能仿毛文龍「結滿挾鮮」之故技,在明金兩強的夾縫中建立第三勢力,但戰事卻頗失利。三月,周文郁所統率的舟師連續敗叛軍於龍王塘(在大連與旅順之間)、雙島、三山島、廣鹿島和黃骨島,還傳檄朝鮮派兵自陸上阻遏孔有德之退路。(註115)

由於耿仲明原為金國遼人,被劉興祚遣來投附皮島,(註116)是金人眼中的「逃人」,故不敢貿然輸誠,遂乞降於周文郁,聲稱願以「修築南關,恢復金州」贖罪,文郁許之,不料「忌者率人放炮攻賊」,叛軍遂不得已降金。(註117)前述之「忌者」應為黃龍所指使(黃氏未躬親追勦),此因周氏如能立功,將很可能正式取代其職,黃龍因有此一心結,故不願全力配合;(註118)再者,黃龍或亦為報已被耿仲裕拷綁之辱,以及妻子遭耿仲明和孔有德執殺之痛,而欲對叛軍趕盡殺絕。

崇禎六年四月十一日,自封為「總提兵大元帥」的孔有德和「總督糧餉總兵

112. 毛霽,《平叛記》,頁63-67;《明清史料》,甲編,第8本,頁742、744;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等編,《中國明朝檔案總匯》,第81冊,頁28-29;第83冊,頁67-68。

113.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等編,《中國明朝檔案總匯》,第83冊,頁86-91。

114. 沈演,《止止齋集》,卷33,頁30。

115. 周文郁,《邊事小紀》,卷3,頁26-36。

116. 葉覺邁修、陳伯陶纂,《東莞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6,《中國方志叢書》景印民國十年鉛印本),卷61,頁39。

117. 周文郁,《邊事小紀》,卷3,頁33。

118. 李學智先生以為「忌者」或為尚可喜。但因周文郁的《邊事小紀》序刊於崇禎十五年,故他實無理由為已降清且封王的尚氏隱諱其名,事實上,周氏在該書中乃直稱尚可喜為「賊黨」。相對上,該「忌者」為金聲桓的可能性較大,因金氏當時乃奉黃龍之命隨周文郁攻賊,由於崇禎末年他仍為明軍副將,周氏或因此姑隱其名。參見毛霽,《平叛記》,頁68;周文郁,《邊事小紀》,卷3,頁36;談遷,《國榷》,卷97,頁5838;錢謙益,《牧齋初學集》,卷73,頁16;李學智,〈孔有德、耿仲明降清始末及明史黃龍傳考〉,頁1-24。

官」耿仲明，在致書皇太極乞降的手本中有云：

本帥見有甲兵數萬，輕舟百餘，大砲、火器俱全。有此武備，更與明汗同心合力，水陸並進，勢如破竹，天下又誰敢與汗為敵哉？……汗若聽從，大事立就，朱朝之天下轉眼即為汗之天下矣！

此外，「原任副將、今管元帥標下參贊軍機都督總兵官」的王子登，亦稱「天下強兵莫過汗，遼兵次之」，建議在結盟之後先拿下旅順次攻北京，並稱：「大事若成，朝廷讓與汗做，吾帥主（筆者按：指孔有德）只願封為安樂王，同享富貴榮華而已。」（註119）而王子登早在毛文龍死後即曾與耿仲明論及降金事宜。（註120）

四月十五日，在金國重兵的翼護之下，孔有德和耿仲明率眾在鴨綠江出海口降金。投降時乃以船百艘載去男女一萬兩千餘人：內含現任及原任的副將、參將和遊擊一百零七員；精壯官兵三千六百四十三名，家小七千四百三十六人；水手壯丁四百四十八人，家小六百二十四人，至於軍器、槍砲等一應物件俱全。（註121）七月，周文郁以未能擒獲孔、耿而遭革任聽勘。（註122）

此一持續十八個月的兵變雖告一段落，然而，叛軍在萊州以東已造成「殘破幾三百里，殺人盈十餘萬」的結果，且「萊城之外二百里，血染黃埃；萊城之內五六月，巷堆白骨」，「登州塗毒年餘，賊所至屠戮，村落為墟，城市蕩然無復曩時之盛」。（註123）先後有山東巡撫徐從治、登萊巡撫謝璉、萊州知府朱萬年、平度知州陳所問、新城知縣秦三輔、黃縣知縣吳世揚和總兵張可大等官員被叛軍所殺，並導致兵部尚書熊明遇因此罷職聽勘、督理劉宇烈發戍遠衛、登萊巡撫孫元化伏誅、山東巡撫余大成逮治、山東巡按王道純革職、登州道宋光蘭及監軍道王徵遣戍、天津總兵王洪及保定總兵劉國柱革職提問，直接的影響不可謂不大。

119. 此段參見張存武、葉泉宏，《清入關前與朝鮮往來國書彙編（1619-1643）》，頁578-581。

120. 任世鐸等譯，《滿文老檔》，頁1151-1155。

121. 周文郁，《邊事小紀》，卷3，頁34；李光濤編，《明清檔案存真選輯三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5），圖版10-1至10-3。

122. 文郁後歸隱西湖，其友黎遂球為其詩集題序時慨嘆曰：「所握手共事者，非死于口（筆者按：此應為避「虜」字而不書），即死于法（應指孫元化等人），幾一時頓盡。」參見周文郁，《邊事小紀》，卷3，頁35-36；黎遂球，《蓮鬚閣集》（《四庫禁燬書叢刊》景印康熙間刊本），卷18，頁48-50。

123. 汪楫等，《崇禎長編》，卷64，頁24；方汝翼、賈瑚修，周悅讓、慕榮榦纂，《增修登州府志》，卷13，頁15。

四、兵變對明清鼎革的影響

吳橋之變不僅僅是發生在山東一省的兵變，其過程還與明季黨爭有密切糾葛，成為當時政爭中互鬥的焦點。先是，崇禎元年（1628）十月會推閣臣，禮部侍郎錢謙益命其門人瞿式耜在背後運作，導致禮部尚書溫體仁和侍郎周延儒均被擯棄於名單之外。此事經體仁揭發後，謙益遭奪官閒住，延儒亦未能入閣，而體仁則引疾去。二年十二月，周延儒陞授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三年六月，溫體仁亦入閣，九月，延儒更成為首輔。（註124）

皮島的動亂隨即被政敵引為攻擊周延儒的重要藉口，陝西道試御史余應桂於是嚴辭抨擊與周氏關係密切的孫元化，稱：

如登撫孫元化者，歲費金錢八十餘萬，叱之毛文龍之舊已數倍矣！料理兩年，無論復四州、援大凌，即島兵兩變，亦且充耳無聞。且登兵號二萬之眾，調赴關寧者，止二千五百而已云。盡如此破綻，罪已滔天，業經自簡，而延儒何以堅護不休，則以同鄉入幕，參、貂、白蠟每月一至耳。然臣非無據也之言也，寧遠海口副總兵周文郁，延儒之家奴也，元化敘殺劉興治之功，侈及文都【郁】，隔海敘功，不敢遺其家奴，其諂事延儒，亦何所不至乎？（註125）

山西道試御史衛景瑗也聲稱周延儒因受孫元化賄賂，以致始終曲為護持。（註126）周氏乃於五年五月援引徐光啟入閣為東閣大學士，試圖共謀替元化脫罪。（註127）

朝臣對周延儒的攻擊並不因吳橋兵變的結束而日趨緩和，如原任兵科給事中的孫三傑即疏稱：

今日養叛陷城、通款辱國之事……實無一非延儒所為……明知元化、禾

124. 張廷玉等，《明史》，卷110，頁3384；卷280，頁7180；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北京：中華書局，1982），頁61-63。

125. 周延儒與元化有同年舉江南鄉試之誼，且延儒的親族文郁也與元化相熟，文郁且曾於天啟間在遼東經略孫承宗幕中與元化共事多年。參見周文郁，《邊事小紀》，卷1，頁5；黎遂球，《蓮鬚閣集》，卷4，頁26。

126. 汪楫等，《崇禎長編》，卷53，頁13、18。

127. 文秉，《烈皇小識》，卷2，頁39。

嘉無功而冒，節餞不足服人，則設為復廣寧，圖金、復、海、蓋之議，既而一事無成……孫元化開府登州，結孔有德為心腹，縱遼兵肆劫，通國知其釀禍，延儒與熊明遇極力庇之……元化則實恃延儒在內，自分可以不死，乃束身歸命，以為撫局張本……皇上大奮乾綱，立置元化於法，罷明遇，逮字烈，延儒則竟以巧言支飾得免於罪……延儒一日在位，海宇一日不寧。（註 128）

三傑雖遭切責，但仍陸續上疏糾劾周延儒。延儒本冀望獲得溫體仁聲援，但體仁不僅不應且背地陰加打擊，延儒因此於六年六月引疾乞歸，體仁遂代其為首輔，徐光啟則於十月卒，令親天主教人士自崇禎初年所進行的軍事改革畫上休止符。（註 129）

天聰七年（崇禎六年，1633）六月，皇太極封孔有德為都元帥，耿仲明為總兵官，並召二人陛見。皇太極率諸貝勒出瀋陽城十里迎接，並不顧眾人反對，用抱見禮相待，以示優隆。抱見之禮為滿人傳統中最高的會見禮節，兩造需互相抱腰接面，彼此地位平等，無行禮、受禮之分，以表達雙方誠摯親密的感情。（註 130）皇太極通常只有在迎接凱旋歸來的兄弟時，始行此禮，（註 131）查天聰四年阿祿部落來歸時，皇太極就只命諸貝勒出城五里相迎，而當阿祿三貝勒朝見時，亦僅於叩頭禮後，再行抱膝禮，並未特許其抱見。（註 132）

孔、耿二人所獲得的優遇乃前所未有的，此因其所攜來的舟師和大砲一直是金兵最欠缺的。皇太極透過先前在寧遠、錦州、灤州和麻線館等役的敗戰，早已深刻體認到紅夷大砲的威力，並開始嘗試利用漢人工匠鑄砲，但品質和數量一直還未能滿足需求。孔有德與耿仲明在叛變後所曾擁有的紅夷大砲，最少應有二十七門，投金時或只帶出較精良的約十二門，惟此已相當於當時金國所擁有之總數。且其部下因直接受到澳門銃師的調教，並在兵變中擁有豐富的實戰經驗；無怪乎，皇太極會用抱見禮來表達其對這支部隊來歸的重視。（註 133）

128. 汪楫等，《崇禎長編》，卷 62，頁 6-7。

129. 張廷玉等，《明史》，卷 308，頁 7927-7928；孫致彌，《欽定四庫全書》（濟南：齊魯書社，2001，《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景印乾隆間刊本），卷 2，頁 7。

130. 王冬芳，《滿族崛起中的女性》（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1996），頁 167-171。

131. 天命十一年十月，副將楞額禮自巴林還，俘獲甚多，皇太極出城十五里相迎，並特許行抱見禮，此或因其即位未久，為收人心，且當時恰逢明寧遠巡撫袁崇煥派人來弔太祖喪，遂特地邀明使觀禮以壯聲威。參見《清太宗實錄》，卷 1，頁 28。

132. 《清太宗實錄》，卷 7，頁 107。

133. 此段參見黃一農，〈紅夷大砲與皇太極創立的八旗漢軍〉，頁 74-105。

在吳橋之變期間，尚可喜先鎮守旅順，有效地阻止東江叛軍對登州的增援；次奉黃龍之命，率戰船南進，防止孔有德從海上突圍，卻不幸遇颶風而「全軍散沒」，登陸後被圍登將領祖大弼疑為叛軍，欲殺俘冒功，幸經黃龍救回旅順，再轉駐鹿島。孔有德逃離登州後，尚可喜和金聲桓等奉黃龍之命出海隨周文郁攻賊。尚、金二人原為毛文龍親信，並曾易姓毛，可喜之父學禮（?-1624）且與毛文龍相交，故在追勦時均「包藏禍心，陰通陽縱」。（註134）

崇禎六年六月，金國精銳以孔有德和耿仲明為前導，並配置西洋砲十二門以及大量佛郎機銃，遂攻陷旅順，黃龍力戰殉國，尚可喜的妻妾及家口數百人亦死。皇太極為切斷皮島與登萊之間的聯繫，並威脅京津，下令留兵二千五百人駐守旅順，此舉奠定了崇禎十年清軍攻陷皮島的基礎。（註135）此戰乃孔、耿二人為金國立功的首役，除因旅順是兵家必爭之地外，更為報黃龍先前的阻截之仇。（註136）

繼黃龍出鎮皮島的沈世魁，初以其女嫁毛文龍為妾而獲重用。（註137）沈氏心嫉黃龍，乃於崇禎四年囑使島兵將其囚禁，尚可喜因率兵平變並扶黃龍復出視事，令世魁恨之入骨。此故，沈氏在執掌東江大權後，遂設計欲殺之。尚可喜不得已乃於崇禎六年十二月舉兵掠廣鹿、大小長山、石城、海洋五島，並率兵民萬餘人降金。（註138）

崇德元年（崇禎九年，1636）四月，皇太極稱帝，國號大清，旋封孔有德為恭順王、耿仲明為懷順王、尚可喜為智順王，併稱三順王，其地位高過舊漢人，名義上等同於八和碩貝勒；且為凸顯對投誠者的厚遇，皇太極讓三王仍維持其原有部隊的組織和統帥權，征戰時則隨漢軍旗「行走（滿文為 yabubumbi，即按照執行之意）」。（註139）由於三順王直屬皇帝管轄，透過此一新編制，皇太極同時強化由己

134. 周文郁，《邊事小紀》，卷3，頁26-37；釋今釋（本名金堡）編、張允格續編，《平南王元功垂範》（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景印乾隆三十年刊本），卷上，頁3。

135. 沈演，《止止齋集》，卷33，頁30；魏剛，〈明與後金對旅順的爭奪〉，《遼寧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2（大連：1999），頁86-88。

136. 沈演，《止止齋集》，卷33，頁30；釋今釋等，《平南王元功垂範》，卷上，頁6-7；黃一農，〈紅夷大砲與皇太極創立的八旗漢軍〉。

137. 楊嗣昌有云：「沈世魁者本一賈頭牙行，有女絕色，毛文龍納之為妾，寵冠一時。文龍死，劉興治納之；興治死，陳繼盛納之；繼盛死，黃龍又納之；至黃龍死前，此婦乃死。而歷毛、劉、陳、黃四姓，皆尊世魁為沈太爺。」參見楊嗣昌，《楊文弱先生集》，卷15，頁30-31。

138. 釋今釋，《平南王元功垂範》，卷上，頁7-11。

139. 細谷良夫，〈歸順于清朝（後金）的漢人〉，收入《清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0），頁51-59。

所控制的軍事力量，不再只是八家均分制度下的「一整黃旗貝勒」。(註 140)

翌年正月，在三順王砲隊的支援下清軍征服朝鮮。四月，皇太極派阿濟格攻陷皮島，沈世魁戰死，軍民被殺者或達五、六萬人。五月，皮島之役中幸運脫逃的副將沈志祥（世魁的從子），復召集潰卒至石城島。崇禎十一年，沈志祥率二千餘軍民降清；次年，受封為續順公。至此東江各島嶼上僅剩殘卒，難以成軍。是年夏，明兵部尚書楊嗣昌更撤島，盡徙諸島兵民至寧遠和錦州。諷刺的是，對許多人而言，並不認為此舉可惜，反而是抱持「二十年積患，一朝而除」的心態。(註 141)

吳橋之變也促成了吳襄父子的崛起。吳襄本因在崇禎四年救援大凌河城的長山之役逃陣而被免去總兵職，其子三桂原為副將，亦同被處分，兩人在此變戴罪隨軍入關。吳襄因於解萊（州）復黃（縣）之役中有功，得復原職。(註 142) 崇禎五年十一月，援勦登州之總指揮金國奇病卒，吳襄奉命瓜代。六年十二月，敘復登州之功時，吳襄更以武官中首功晉都督同知、世襲錦衣衛百戶，三桂亦實授都督僉事。三桂驍勇善戰，除受其舅父祖大壽庇蔭外，更認太監高起潛（迄明亡均在關寧監軍，權傾一時）為義父，遂於十二年陞授遼東總兵。十五年，祖大壽以錦州降清，堅守多年的寧錦防線被攻破；是年，清朝擴編漢軍為八旗，以祖澤潤（大壽子，大凌河之役降）等八人為固山額真。十七年四月，三桂開山海關降清，李自成於是殺被擄的提督御營右都督吳襄；十月，清封三桂為平西王。(註 143)

隨著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沈志祥、祖大壽、吳三桂等遼將次第投降，清軍等於收編了「三方布置策」中最主要的幾股勢力：一是以「後毛文龍時代」諸島將為核心的東江集團，一是以吳三桂和祖大壽甥舅為核心的關寧集團。(註 144) 孔有德和耿仲明在吳橋之變時雖與尚可喜和吳三桂兵鋒相對，但四人卻均藉兵變崛起，並先後降清封王；雖然吳三桂在異姓四王當中封爵最晚且年紀最輕，但因其開山海關之功最大，位望反而後來居上。(註 145) 這群遼將與清廷結合成一強有力的利益共同體，在一統江山的過程中扮演關鍵性力量，並成功地從邊陲登上歷史的主

140. 謝景芳，〈八旗漢軍的建立及其歷史作用〉，《社會科學輯刊》，3（瀋陽：1987），頁 69-74。

141. 黃一農，〈劉興治兄弟與明季東江海上防線的崩潰〉，頁 131-161。

142. 汪楫等，《崇禎長編》，卷 65，頁 11。

143. 此段參見滕紹箴，《三藩史略》，頁 117-123、392-403；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補遺》（《續修四庫全書》景印光緒三年鈔本），卷 5，頁 5-6；談遷，《國權》，卷 101，頁 6077；滕紹箴，〈清初漢軍及其牛糸探源〉，《滿族研究》，1（瀋陽：2007），頁 60-72。

144. 王景澤，〈明末的「遼人」與「遼軍」〉，《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3.1（北京：2003），頁 26-32。

145. 趙爾巽等，《清史稿》，卷 474，頁 12841。

舞台，建立遼人前所未有的功業。（註 146）

順治元年（1644），孔有德隨睿親王多爾袞入關，復從豫親王多鐸西討李自成。二年，因陝西既平，乃移師定江南。三年八月，有德獲授為平南大將軍，率耿仲明、尚可喜及沈志祥等南征；五年春，湖南底定，志祥尋卒，無子，由其兄子永忠襲爵。六年五月，改封有德為定南王，征廣西，同時命仲明（改封靖南王）和可喜（改封平南王）征廣東。十一月，仲明因部下隱匿逃人三百餘名而畏罪自經。八年正月，有德奏移藩屬駐桂林。九年七月，明將李定國破桂林，有德兵敗自殺。十一年六月，有德的靈柩運至北京，本擬續送往老家遼陽，但因其女四貞為便於就近祭掃，遂乞請給地葬於京城，而先前已建於遼陽的墓園就改成衣冠塚。（註 147）由於有德絕嗣，孝莊皇后遂將四貞育於宮中，後嫁孫延齡為妻。延齡之父孫龍為有德最親信之人，他以「總督大旗副將」的身分隨其降清，（註 148）累進世職至二等阿思哈尼哈番，並與有德一起戰死在桂林。十三年，尚可喜與耿繼茂（仲明之子）擊退李定國，同在廣州開府。十七年，繼茂移福建，由可喜專鎮廣東。康熙元年（1662），吳三桂因功進為親王。五年，孫延齡獲授為鎮守廣西將軍，統有德舊部。十年六月，耿繼茂卒，長子精忠襲封，仍鎮福建。（註 149）

查清朝罕有以異姓封王者，（註 150）且為籠絡三藩更透過聯姻以強化其向心力，如吳三桂獲賜四滿洲婦，三桂長子應熊、尚可喜第八子之隆、耿繼茂之子精忠和聚忠，均因賜婚宗室女而封和碩額駙，繼茂子昭忠亦授多羅額駙。又，吳應熊女嫁恭親王常寧為妾，尚之隆之女亦嫁純親王隆禧為嫡福晉。此外，孔有德女四貞與孫延齡成婚後，延齡亦被破格晉封為和碩額駙。（註 151）

清朝入關之初，八旗中的漢人遠遠超過滿洲和蒙古。如據順治五年的統計，八旗男丁共三十四萬六千九百三十一丁，其中滿洲五萬五千三百三十丁，蒙古兩萬八千七百八十五丁，漢軍四萬五千八百四十九丁，包衣漢人（含大量旗下家奴）二十

146. 葉高樹，《降清明將研究（1618-1683）》（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1993），頁 115-123。

147. 李大偉，〈孔有德葬地考〉，轉引自 <http://www.xudewang.cn/search/doc/110694>。

148. 《明清史料》，丙編，第 1 本，頁 26。

149. 趙爾巽等，《清史稿》，卷 234，頁 9395-9413；卷 474，頁 12835-12841。

150. 除三順王外，僅崇德元年揚古利因攻朝鮮時戰死而追贈武勳王、順治十四年孫可望因來歸封義王、康熙十四年黃芳度因戰死漳州而贈忠勇王等少數事例，但其爵均未世襲。參見昭槁，《嘯亭雜錄》（《續修四庫全書》景印清鈔本），卷 10，頁 569。

151. 劉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頁 460-465；杜家驥，〈清代《玉牒》中的滿族史資料價值〉，《故宮學術季刊》，23.4（臺北：2006），頁 41-62。

一萬六千九百六十七丁。（註 152）至於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吳三桂、沈志祥五人的下屬與子弟，則稱「藩下佐領」，不分隸八旗，直到三藩亂平之後始編入漢軍。但不論是漢軍佐領、藩下佐領或包衣旗鼓佐領，他們絕大部分為遼人，並是幫助清朝迅速打敗明軍並協助統治的重要支柱，如順治朝遼人即佔了總督和巡撫缺的約 77%，布政使與按察使的 48%，道員的 34%，知府的 39%，州縣正官的 21%；漢軍至康熙朝亦仍佔總督和巡撫缺的 51%。（註 153）

康熙十二年（1673）十一月，由於撤藩一事引發疑慮，吳三桂起兵叛清，稱周王元年；孫延齡旋於廣西叛；耿精忠亦叛於福建。十四年正月，清廷封尚可喜為平南親王，以其次子之孝襲爵，並授平南大將軍；十五年二月，可喜長子之信起兵叛清；十月，可喜病卒；十六年，孫延齡聽孔四貞之勸欲反正，但遭吳三桂派人執殺；十七年三月，三桂稱帝，改元昭武；八月，病卒，其孫世璠繼立；二十年九月，世璠兵敗自殺。（註 154）三藩之亂至此弭平，清前期以軍功起家的遼人勢力也從絢爛歸於平淡。

五、兵變對在華天主教的影響

明末天主教在中國的重要發展策略之一，即是所謂的「知識傳教」，希望透過西曆和西砲等先進科技文明能吸引統治階層的注意。孫元化是徐光啟一手栽培的奉教門生，西學造詣深厚，他除協助徐氏刪定《句股義》外，還撰有《經武全編》和《西法神機》等兵書，以及《西學雜著》、《幾何用法》、《幾何體論》、《泰西筭要》等算書，其在鑄造火砲、配製火藥以及建置砲臺的經驗與能力，連徐光啟都自嘆弗如。元化自號火東，即蘊含「以火攻之術制東夷」的寓意與抱負。（註 155）

152. 安雙成選譯，〈順治朝八旗男丁滿文檔案選譯〉，收入閻崇年編，《滿學研究（第一輯）》（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頁 413-430。

153. 此段參見李燕光、關捷，《滿族通史》（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1991），頁 440-451；楊學琛，《清代民族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頁 99-101；劉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會》，頁 579-596；姜守鵬，〈明末遼東勢族〉，《社會科學戰線》，2（吉林：1987），頁 203-209；渡辺修，〈順治年間（一六四四～六〇）の漢軍（遼人）とその任用〉，收入石橋秀雄編，《清代中國の諸問題》（東京：山川出版社，1995），頁 181-204；劉鳳云，〈清康熙朝漢軍旗人督撫簡論〉，《滿學研究》，7（北京：2002），頁 350-372。

154. 趙爾巽等，《清史稿》，卷 234，頁 9414-9416；卷 474，頁 12842-12862。

155. 參見張世偉，《張異度先生自廣齋集》，卷 12，頁 14-26；黃一農，〈天主教徒孫元化與明末傳華的西洋火砲〉，頁 916-917。

孫元化在出任登萊與東江的方面大員之後，不僅積極自澳門引進西洋大砲和葡萄牙銃師，其帳下亦有天主教徒王徵和張燾分任監軍和副總兵之要職。當時較知名的奉教士大夫當中，李之藻和楊廷筠（1562-1627）已故，徐光啟則任禮部尚書。教會當局原本期盼元化的積極任事能對在華傳教事業大有助益，然而，吳橋兵變的爆發卻讓教中人士十多年來引介西方先進砲學的努力化作灰燼，甚至轉為敵人所用。而隨著孫元化和張燾的棄市、王徵的免官、徐光啟的病卒，天主教在朝中的影響力也急遽淡出。

在吳橋之變的過程中，可能也有反教的因素間接發酵。如王象春同年進士當中最親近的兩位好友文翔鳳與錢謙益，（註 156）即十分排斥天主教。文氏嘗為南京禮部侍郎沈淮的《南宮署牘》一書作序，此書收有沈氏於萬曆四十五年（1617）所掀起「南京教案」的大量文件，該案對天主教的打擊頗大，不僅將中國教徒定罪，且將西洋耶穌會士驅逐出境。（註 157）文氏在序中稱譽沈氏最大的功績即在「逐二十年橫議陰謀之西夷」，並抨擊西人以朝貢為藉口停留中國，稱：

西洋人之來，跡益詭，說益巧，比於盜矣……解之者曰：「觀化慕義以朝貢至。」信然？二十年而自廣始達京師者，朝貢耶？分布諸省，而盜吾儒事天之說以文其術者，朝貢耶？明以胡人耶穌為上帝之化身，而實其生於漢哀帝時，此其罪，王制所誅。（註 158）

錢氏則嘗指天主教是世間三大「妖孽」之一，並稱如果不將之去除，則「斯世必有陸沈魚爛之禍」。（註 159）主戰的山東巡按謝三賓即為錢謙益的門生，兩人關係密切。（註 160）

此外，殉國的山東巡撫徐從治先前亦曾以南京禮部主客清吏司署司事的身分參與審理「南京教案」；（註 161）而其弟昌治在萊州被圍時，嘗疏控劉宇烈誤國，崇禎十二年（1639）更出版影響頗大的《聖朝破邪集》，彙編士大夫以及佛教徒聲討

156. 參見何成，《新城王氏》，頁 217-219。

157. 張維華，〈南京教案始末〉，《齊大月刊》，1.2（濟南：1930），頁 93-106；1.3（濟南：1930），頁 191-208。

158. 沈淮，《南宮署牘》（日本尊經閣文庫藏明末刊本），前序。

159. 黃宗羲著、沈善洪編，《黃宗羲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1994），第 11 冊，頁 389。

160. 錢謙益，《牧齋初學集》，卷 36，頁 20-21；卷 53，頁 17-19。

161. 徐昌治，《聖朝破邪集》（京都：中文出版社，1984，景印安政三年刊本），卷 2，頁 13-19。

天主教的文書與論述。(註 162) 由於徐從治兄弟與天主教的糾葛頗深，再加上與叛軍不共戴天的東江總兵黃龍微時嘗獲沈淮拔舉，(註 163) 而守萊之人亦不乏信奉伊斯蘭教者，(註 164) 這些人有可能會將此變的罪源歸之於天主教人士，並因此對曾受奉教官員領導和訓練的孔軍更加敵視。

孫元化和張燾被崇禎皇帝處死一事，可能導致其後人心懷怨懣，遂在明亡清興的過程中選擇投向新朝。至於元化的許多部屬，更因吳橋兵變而意外踏上更大的歷史舞台，如元化之孫致彌嘗在〈歐羅巴劍子歌〉一詩中有云：

健兒帳下走黃劉（謂總兵龍、靖南伯蜚、副總兵惟正、鎮南侯得功、東平侯澤清、□□侯良佐、副將興祚），壯士軍中重王祖（大將軍廷臣、大壽，遊擊可法）。孔吳已見際風雲（定南王有德、贈平西王襄、今平西王三桂），耿尚頻聞建旗鼓（靖南王仲明、平南王可喜）。自餘名將不可數，劇盜降丁或卒伍（褚正行，梁山泊寨首；孫克，滿州人；公沙·的西勞、若盎·末略，俱小西洋人；白登庸、王弘基、張燾、吳進勝及黃、劉輩，皆起於卒伍）……。(註 165)

指稱鼎革前後叱吒風雲的名將中不乏其祖父的下屬：除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和吳三桂受封為清朝的異姓王外，總兵劉澤清、劉良佐和黃得功分據弘光朝時江北四重鎮之三；劉興祚、黃龍、王廷臣、黃蜚和黃得功於抗清時殉明，祖大壽、祖可法、劉良佐等人降清，而劉澤清和吳三桂則於降清後復叛。(註 166) 至於黃蜚，乃

162. 查時傑，〈明末佛教對天主教的「關邪運動」初探〉，收入《明清之際中國文化的轉變與延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頁 485-529；徐昌治，《無依道人錄》（法國國家圖書館藏康熙六年刊本），卷下，頁 22-28；Adrian Dudink, “The Sheng-Ch’ao Tso-P’i (1623) of Hsu Ta-Shou,” in *Conflict and Accommodation in Early Modern East Asia, Essays in Honour of Erik Zürcher*, Leonard Blussé & Harriet T. Zurndorfer eds. (Leiden: E. J. Brill, 1993), pp. 94-140.

163. 沈演，《止止齋集》，卷 33，頁 28。

164. 如鄉紳張忻是當時回教界的知名人士，曾撰《清真教考》；力戰殉國的萊州衛指揮李夢果和百戶白仲仁，亦是色目人（多信奉回教）後裔。參見劉智，《天方至聖實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景印乾隆四十三年重印本），卷 20，頁 15-18；張思勉修、于始瞻纂，《掖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6，《中國方志叢書》景印乾隆二十三年刊本），卷 4，頁 39。

165. 孫致彌，《林左堂集》（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景印乾隆間刊本），詩，卷 1，頁 17-19。

166. 張廷玉等，《明史》，卷 268，頁 6901；卷 271，頁 6970；卷 274，頁 7018；卷 277，頁 7096；卷 277，頁 7106。趙爾巽等，《清史稿》，卷 3，頁 75-76；卷 171，頁 5651。顧炎武

與黃得功以兄弟相稱，本姓涂，隨其舅黃龍在軍中發展，並改從母姓，陰作龍子；黃龍戰死後，由於其親子先前被叛軍所殺，乃以蜚襲廕，歷官至應天後軍府都督；弘光元年（1645）九月，兵敗被殺。（註167）其中張燾、黃蜚、孔有德、耿仲明、王廷臣、白登庸、（註168）王弘基、吳進勝等人，均曾奉孫元化之命增援大凌河；而黃龍、黃惟正、（註169）張燾、劉澤清、劉良佐、吳襄、吳三桂、公沙·的西勞、若盎·末略等人，（註170）則均曾在吳橋之變中參與平亂。

由於孔有德等遼將多曾受恩於孫元化，故入清之後，「當代異姓諸王及一時將相，多通門夙契」。（註171）元化之子和斗即嘗於順治年間至廣州入靖南王耿繼茂幕；迨繼茂於順治十七年（1660）移鎮福建後，和斗之子致彌亦曾赴福州侍父，並與繼茂諸子以及靖藩部將互動頗多，其詩中更有「三世交親久更真」、「不負提攜故將恩」等句，記耿家在發達之後仍不忘孫元化先前的提攜之恩，（註172）而「閩海共誇軍實盛，好消烽火壯皇圖」句，則點出和斗父子欲協助靖南王對抗明鄭，為清廷一統大業立功的心態。（註173）

康熙十三年（1674），耿精忠叛清，其家遭籍沒，搜得往來信件一篋，其中有致彌勸諫耿氏勿反之牋，令康熙帝印象深刻；十四年，精忠未叛清之弟昭忠和聚忠等族人獲釋復官；十五年，精忠降清。十七年，清廷遣使頒孝昭皇后（康熙帝之

著、華忱之點校，《顧亭林詩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59），頁229。

167. 溫睿臨，《南疆逸史》（《續修四庫全書》景印清鈔本），卷49，頁8；楊陸榮，《三藩紀事本末》（北京：中華書局，1985，《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景印康熙五十六年刊本），卷1，頁14。
168. 《明史》中有云：「（沈世魁）從子副將志科集潰卒至長城島，欲得世魁敕印。監軍副使黃孫茂不予，志科怒殺之，並殺理餉通判邵啟。副將白登庸遂率所部降大清。」不僅誤沈志祥為沈志科，且末兩句的句讀亦應作「並殺理餉通判邵啟、副將白登庸，遂率所部降大清。」參見張廷玉等，《明史》，卷271，頁6968-6969；楊嗣昌，《楊文弱先生集》，卷23，頁27-28。
169. 黃惟正當時掌管招練營，參見謝斯茂，《圍城接入書揭》，頁18。
170. 詩中的「若盎·末略」，疑為「若盎（Laurent）·末略（Veglio）」之誤，應即《明實錄》中所稱的魯末略（魯為Laurent的對譯），乃澳門軍事顧問團的副統領。參見董少新、黃一農，〈崇禎年間招募葡兵新考〉，頁69。
171. 沈徵佺，《江東志》，卷9，頁16。
172. 耿仲明曾擔任直屬孫元化的撫標遊擊，元化在登州被俘後即被仲明翼庇在其家，知他與孫氏的關係或應較其他三異姓王親近。參見張世偉，《張異度先生自廣齋集》，卷12，頁23。
173. 方志中有和斗小傳，稱其在鼎革之後「埋名著書，不關世務。中丞部將皆為侯王，延致之。禮以上賓，或諷以仕，輒不應，辭歸食貧」，文中所營造的氣節形象，顯然與事實不符。參見聞在上修、許自俊等纂，《嘉定縣續志》（上海：上海書店，1991，《中國地方志集成》景印康熙二十三年刊本），卷3，頁30；孫致彌，《欽左堂集》，詩，〈前序〉；卷1，頁2-3；卷2，頁7-11及25-26；卷3，頁4及14-17。

后)尊諡於朝鮮，經「都尉耿某」的推薦，(註174)致彌奉派以二品頂戴充副使，負責采詩；致彌雖有詩名，但當時其身分僅為太學生，此舉實屬特典。(註175)

康熙二十七年，孫致彌登進士，為庶吉士，他在散館時曾有「二十六年恩未報，髭雖成雪敢心灰」詩句，知科舉羈縻士紳至深；三十年，致彌因事入獄，禍幾不測；翌年，捐贖復官。(註176)三十三年，他在生日時賦詩曰：

白髮蒼顏五十三，壯游歷歷夢中諳；驪江手捧鸞書過（原注：予嘗奉使朝鮮），閩海身將虎穴探（恢復廈門、海澄之役，予在軍中，總督姚公欲題敘，予力辭之）……。(註177)

自詡平生最得意之舉，一是以布衣充朝鮮採訪使，一是在康熙十九年清軍克復廈門和海澄之役立功。該役乃分由康親王傑書和福建總督姚啟聖率領，鄭經因此敗走臺灣，盡棄福建沿海。致彌雖稱姚啟聖嘗欲題敘其功遭他拒絕，但其實致彌當時僅為布衣，故即使立功，亦很難藉以進入官場。

明末有許多知名天主教徒積極引進紅夷大砲以對抗金國，他們翻譯了一些歐洲的火砲專書，並透過同教、師生或姻親等關係一脈相傳。在明清之際，這些奉教人士依舊經由類似的人際網絡緊密結合，(註178)而西洋砲學的知識也仍在此社群中斷續傳承。如孫元化的家人雖在吳橋之變後，盡焚其兵學著作，但其中《西法神

174. 因臺北故宮的收藏印中有「都尉耿信公書畫之章」，疑此人或為耿繼茂三子昭忠（號信公，娶固山貝子蘇布圖女，為額駙，康熙二十五年卒）。又，孫致彌的友人亦指其「館於耿額駙，耿進其詩於上，遂命與使臣同往」。參見陳康祺，《郎潛紀聞》（《續修四庫全書》景印光緒間刊本），卷6，頁10；陸隴其，《三魚堂日記》（《續修四庫全書》景印同治九年刊本），卷5，頁2；劉偉華，《千華山志》（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2），頁278；故宮書畫檢索資料請參見 http://painting.npm.gov.tw/npm_public/System/View.jsp?type=1&ObjectID=2386。

175. 袁翼，《遼懷堂全集》（《續修四庫全書》景印光緒十四年刊本），文集，卷4，頁3-4；梁國治，《欽定國子監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62，頁4。

176. 劉耘華，〈徐光啟姻親脈絡中的上海天主教文人：以孫元化、許樂善二家族為中心〉，《世界宗教研究》，1（北京：2009），頁98-107。

177. 孫致彌，《杕左堂集》，詩，卷6，頁9-10。

178. 如孫元化為徐光啟門生，不僅同入天主教，兩家且有聯姻之好：光啟第三孫爾斗娶元化女，此女實為元化所撫養之嫡甥女王氏。此外，元化之孫致彌亦娶爾斗之女。致彌與其表兄徐以濟（號有柳，爾斗長子）和徐以棐（字寶弓，爾斗次子）相當親近，也與對天主教相當友善的許之漸和佟國器有所往還。參見王成義，《徐光啟家世》（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09），頁175、182、251。孫致彌，《杕左堂集》，詩，卷2，頁25；卷6，頁12與詞，卷1，頁6。黃一農，《兩頭蛇》，頁88-89、141。

機》一書，則幸經其表兄弟王某（字式九）抄留了一份副本；康熙元年，此書輾轉傳至同里的金造士（字民譽），金氏遂「錄之以示同學」。（註 179）金造士或亦為天主教徒，他與清初奉教的知名畫家吳歷頗多往來，且為致彌的好友。（註 180）相信致彌至福建入靖藩幕或協助姚啟聖痛擊鄭經時，應隨身攜帶此書，而此一「家學」不知曾否助其立功？

至於康親王傑書的幕內，亦見西學西教的蹤跡。康熙十三年，傑書奉命赴閩討伐叛清的耿精忠，他在杭州禮聘了精通火器的布衣戴梓為其幕客，戴氏因此進獻可連射 28 發的「連珠火銃」製法；十五年，為對抗鄭經的軍隊，戴氏更負責監製威力頗大的冲天砲（大口徑之短體臼砲）；十九年，因「佐康王平三藩、征臺灣」有功，命直南書房，賞學士銜。（註 181）戴梓的火攻之學泰半得自其表兄弟張嗣隴（康熙十三年，或亦從傑書征閩，授福清縣丞），而嗣隴之父就是頗精西洋砲學的張燾。（註 182）張燾是孫元化的標將，他曾與天主教徒孫學詩數度至澳門取人取銃，並合撰《西洋火攻圖說》一卷。（註 183）同樣地，李之藻之孫禧熊登順治九年進士，歷官至工部主事；徐光啟之孫爾路於順治十三年廷試授知縣。（註 184）鼎革之初，許多奉教士人以及受西學訓練的將領，也與大多數漢人一樣選擇順應時勢，先後入仕清廷，並幫助已站穩腳步的清朝奠定統一基業。

六、餘論

崇禎初年，原被冀望能扮演牽制金國的東江一鎮，連續發生重大變故：先是，袁崇煥以尚方寶劍斬殺皮島總兵毛文龍；接著，劉興治殺署島副總兵陳繼盛，張燾

-
179. 孫元化，《西法神機》（鄭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4，《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彙·技術卷》景印光緒二十八年刊本書），前序及後跋。
 180. 孫致彌，《枕左堂集》，詩，卷 2，頁 4；吳歷著、章文欽箋注，《吳漁山集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 616、624。
 181. 由於戴梓後與在宮中服務的耶穌會士南懷仁、徐日昇有激烈鬥爭，因疑他或非教徒。參見張先清，〈清代中文史料中的徐日昇形象〉，收入 *In the Light and Shadow of an Emperor: Tomás Pereira, S.J. (1645-1708), the Kangxi Emperor and the Jesuit Mission in China*, Anto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 & Artur K. Wardega ed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forthcoming).
 182. 劉獻廷，《廣陽雜記》，卷 4，頁 11。
 183. 黃虞稷撰，瞿鳳起、潘景鄭整理，《千頃堂書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卷 13，頁 355。
 184. 龔纓晏、馬瓊，〈關於李之藻生平事跡的新史料〉，頁 89-97；應寶時修、俞樾纂，《上海縣志》，卷 16，頁 27-28。

和沈世魁又殺劉興治；然後，新任總兵黃龍遭耿仲裕等亂兵拘禁拷打，好不容易復出視事，卻又發生吳橋兵變。由登萊巡撫掌理的海上防線，經此一連串變亂之後，終於如骨牌般塌垮，進而影響到明朝的覆亡。

就在登萊巡撫孫元化因吳橋兵變而遭棄市的前一年多，袁崇煥亦同樣駢首西市。清初史家計六奇指稱當時百姓對袁氏怨恨至深，以致「爭噉其肉，皮骨已盡，心肺之間，叫聲不絕，半日而止，所謂活剮者也」，甚至有自稱曾見證此事之人曰：「昔在都中，見磔崇煥時，百姓將銀一錢買肉一塊，如手指大，噉之，食時必罵一聲。須臾，崇煥肉悉賣盡。」（註 185）崇煥雖因被誤認作勾引金軍入寇而引發諸多怨尤，但前述之描述應純屬過於誇張的傳聞，或僅某種程度地反映一般民眾的心理。

然而，自明末以來即有許多人主張袁崇煥的棄市與毛文龍之死攸關，清禮親王昭槤（1776-1829）的說法就頗具代表性，稱：

袁崇煥之殺毛文龍，其事甚冤，世儒以崇煥後死可憫，故爾掩飾其過，至謂毛文龍果有謀叛諸狀，非深知當日之事者也……使留之以拒大兵，不無少補。崇煥乃不計其大事，冒昧誅之，自失其助，遂使孔定南諸將陰懷二心，反為本朝所用，此明代亡國之大機。（註 186）

認為袁崇煥殺毛文龍一事導致孔有德等降清，而此乃明亡的關鍵。雖然該兩史事之間有無因果關係，尚無法獲得近代學者的共識，（註 187）但據前文的研究，孔、耿等人之降清確曾深刻影響到明朝的敗亡。

做為明代最大一場兵變的吳橋之亂，導火線的最端點表面上雖僅因一件奪雞小事，但卻造成影響深遠的「蝴蝶效應（Butterfly Effect）」。（註 188）不僅明軍引為長技的西洋火砲以及操作技術轉為清朝所有，孔有德等降將且協助清軍建立全世界最大的專業砲兵部隊之一，並領軍弭平南明諸政權的抵抗。無怪乎，康熙朝曾任庶吉士的金以成在序《平叛記》時有云：「壬申之變猝起吳橋，萊州首當其衝，棄疾

185. 計六奇撰，魏得良、任道斌點校，《明季北略》（北京：中華書局，1984），卷 5，頁 119。

186. 昭槤，《嘯亭雜錄》，卷 10，頁 591-592。

187. 羅志欽編，《袁崇煥研究論文選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頁 484-506。

188. 蝴蝶效應乃美國氣象學家 Edward Norton Lorenz（1917-2008）於 1963 年所提出的理論，指出一件表面上看來關係不大的細微小事，卻有可能帶來巨大改變。他以蝴蝶為喻，指出當一隻亞馬遜流域的蝴蝶煽動翅膀之後，將有可能掀起密西西比河流域的一場風暴。

（筆者按：指加害）於登州，雖其禍亂一隅，乃明之所以亡也！」（註189）認為吳橋兵變是明亡的重要導火線。

吳橋兵變也對許多家族的命運產生深刻衝擊。康熙十四年（1675），被譽為「一代詩宗」的王士禛（1634-1711）嘗作〈漫興十首〉，有一詩即言及釀變的孔有德家族，曰：

慘澹蒼梧野，風塵入桂林。
屠沽投閒起，巾幗負恩深。
銅柱無消息，交州竟陸沉。
何時大藤峽，披豁散重陰。（註190）

其中後四句乃描述當時蔓延西南半壁的三藩之亂；至於「屠沽投閒起，巾幗負恩深」二句，則指出身卑微的孔有德，自吳橋兵變降清後始發跡，其女四貞雖深受清宮撫育之恩，卻與夫婿一同叛清。

有意思的是，斥責孔家的王士禛恰為兵變重要當事人王象春的侄孫。由於象春的詩亦名重當世，錢謙益因此稱譽「鴻裁艷詞，衣被海內」的士禛曰：「新城門第大振於灰沉煙燼之餘，禽息之精陰慶【薦】，在季木可知也。」（註191）指王家在遭逢吳橋兵變等劫難之後，象春（字季木）或在冥冥之中助佑士禛重振家風。新城王氏雖歷經改朝換代的動盪，在科第上依然表現耀眼，順、康間即出了九名進士，王家也仍與淄川畢家結姻不斷。（註192）

康熙十七年，出使朝鮮返國的孫致彌在順天中舉，但未能在翌年的會試中聯捷，時任侍讀學士的王士禛曾賦一詩送其南歸，但字裡行間卻顯得交情泛泛。以致彌甫赴朝鮮采詩的文名，加上他與元化之師友輩名士（如錢謙益、陳子龍、徐光啟、方孔炤、魏大中、侯岐曾等）及其後人間的綿密網絡，交遊遍朝野的士禛理應

189. 《清聖祖實錄》，卷281，頁750；張思勉修，于始瞻纂，《掖縣志》，卷6，頁61-63。金以成之序未收入現存各《平叛記》刊本中。

190. 王士禛著、袁世碩主編，《王士禛全集》（濟南：齊魯書社，2007），頁824。

191. 《王士禛全集》的編纂者誤讀錢氏之文為「禽息之精陰，慶在季木可知也」，其中禽息乃春秋時人，曾向秦穆公力薦賢士百里奚，令秦國迅速強盛。參見王充著、黃暉校釋，《論衡校釋》（長沙：商務印書館，1938），卷1，頁9；王士禛，《王士禛全集》，頁3-4、132-134、4887-4888。

192. 這些進士當中包含象春之子山立（武科）以及士祿、士祐、士禛三兄弟；至於王家「與」字輩及「士」字輩婚配畢氏者，亦至少有八人。參見何成，《新城王氏》，頁42、86-90。

特意結納才對，筆者因此頗疑士禎心中或仍無法完全走出其家在吳橋之變遭到巨禍的陰影。（註193）

明清鼎革其實並不全然是異民族間的衝突，而應有相當程度被定位為不同利益群體間的鬥爭。清朝在征服中國的過程中，得力於明降臣頗多，其中出身遼東地區的武將，更因仕清較久，或滿化較深，以致彼此溝通較易，且戰鬥力較高，而以汗馬勳功成為漢臣的中堅。（註194）迄三藩亂平之後，以軍功起家的遼人才淡出軍政核心，其權力則被科舉出身的漢人所取代。（註195）吳橋兵變（1632-1633）和三藩之亂（1673-1681）應就是遼人在十七世紀中國從崛起以迄退場的兩個重要轉折點，而由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吳三桂這四個最亮眼的遼人家族貫穿其間。

入清以來，以遼人為主體的漢軍旗人和漢姓包衣（又稱作包衣漢軍或內務府漢軍），（註196）因共同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的影響，令其心理意識更貼近滿族，風俗習慣也高度滿化。然而，漢軍從來就只被當作是「在旗的漢人」，如在考選任官的制度上，漢軍就與漢人同榜，亦與漢官一體升轉，官缺也與漢職一致。漢軍往往尷尬地發現自己介於「旗、民」或「滿、漢」之間，甚至仍被滿洲統治階級視同奴僕。康熙六年，儲方慶在殿試策中，即曾生動描述此一地位，曰：

至於滿漢之外，復有漢軍一途，其仕之尊顯者，亦列於公孤之選，然位雖尊於天家，而名仍隸于私室。方其得位之時，非不赫然貴矣，一遇其主，則俛首帖耳，執役之不暇，舉人世可卑可賤之事，恒視為固然，而不敢少有所牴牾。（註197）

當乾隆帝為解決八旗制度因「包管」和「恩養」所產生的困境時，更在「首崇滿洲」的思維下，強迫駐防各地的大多數漢軍「出旗為民」。（註198）

193. 王士禎，《王士禎全集》，頁926、5084-5085；沈徵佳，《江東志》，卷4，頁7；孫致彌，《秋左堂集》，詩，卷1，頁9-17；卷3，頁10-11及14。

194. 葉高樹，《降清明將研究（1618-1683）》，頁302-305；楊學琛，《清代民族史》，頁101-104。

195. 如清末黃濬即曾指出：「清自乾隆以後，得有天下，實皆漢人之功，即三藩削平時，力量已竭蹶，詞科八股亟事懷柔，更無改革文字風俗之勇氣，此亦滿終為漢同化之一因。」參見黃濬，《花隨人聖盦摭憶》（臺北：文海出版社，1988，《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景印民國三十二年鉛印本），補篇，頁96。

196. 張書才，《曹雪芹家世生平探源》（瀋陽：白山出版社，2009），頁15-35、95-102。

197. 儲方慶，《儲遜菴文集》（《四庫未收書輯刊》景印康熙四十年刊本），卷6，頁5。

198. 此段參見孫靜，〈試論八旗漢軍與滿洲的差異性〉，《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社版）》，5（北京：2006），頁51-57；定宜庄等，《遼東移民中的旗人社會：歷史文獻、人口統計與田野調

乾隆帝晚年且為籠絡漢人並強化君臣之義，（註 199）命國史館將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遼人的開國功臣列入〈貳臣傳〉，譏刺他們「遭際時艱，不能為其主臨危授命，輒復畏死倖生，覲顏降附」，並將已經歸順卻又叛亂的吳三桂入〈逆臣傳〉，還責其「形同狗彘，覲顏無恥」。（註 200）隨著孔有德在清官方的歷史地位日益低落，北京的孔王墳至十九世紀初已形同廢墟。至於位在遼陽城東南的衣冠塚，亦罕人聞問；道光間，遼陽名士馬瑀林曾至該地憑弔，並賦一詩曰：

此日教誰歎可人，當年苦戰際風塵。

拼將一具英雄骨，博得姓名冠貳臣。

……

不有近郊三百戶，誰將麥飯祭清明。（註 201）

慨嘆孔有德雖為滿清立下勳功，卻被列名於〈貳臣傳〉，且原先守墳之人也已不再定期掃墓。

民國二十四年（1935），在北京孔王墳遺址上經營農場的遼人高紀毅，挖出一方〈定南王孔有德碑〉，（註 202）順治皇帝在此御賜文中有云：

尔定南王孔有德憤時崛起，舉眾破山東登、萊諸州郡，航海來歸。我太宗文皇帝嘉其慕義，敕為元帥，繼而冊封為恭順王，世世不替。朕定鼎中原，王身當屢戰，多獲捷功。百粵未附，特命掛定南王印，率師往征。首定湖南，旋下兩廣，只因桂林之役兵分勢寡，徵調不及，力竭捐生，雖古之烈丈夫無以踰此……。

查》（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頁 196-234；謝景芳，〈清代八旗漢軍的瓦解及其社會影響：兼論清代滿漢融合過程的複雜性〉，《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社版）》，3（北京：2008），頁 57-66；張玉興，〈包衣漢姓與漢軍簡論〉，《滿學研究》，7（北京：2002），頁 323-343。

199. 當時曾重新評價明季殉節諸臣的歷史地位，參見黃一農，〈正史與野史、史實與傳說夾縫中的江陰之變（1645）〉，收入陳永發主編，《明清帝國及其近現代轉型》（臺北：允晨文化公司，2011），頁 131-202。

200. 葉高樹，《降清明將研究（1618-1683）》，頁 287-297。

201. 轉引自李大偉，〈孔有德葬地考〉。本節中有關〈定南王孔有德碑〉的討論亦見此文。

202.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第 61 冊，頁 69。

由於當時四漢人異姓王均尚戮力為大清攻掠天下，而孔有德是其中第一位過世的，又戰死沙場，故順治帝極譽他在清朝定鼎中原的過程中功績厥偉。

高紀毅為替評價日益低落的孔有德抱不平，遂於翌年請同鄉吳甌撰〈清定南王孔有德墓碑後記〉一文，並鐫刻在此碑的碑陰上，曰：

孔有德在《清史》列〈貳臣傳〉，此苛論，非定評也。有德初隸毛文龍部，一小校耳，無專閫之寄，守土之責也。文龍被殺，部下憤懣，或至激而投敵。有德獨陳兵東海，以都元帥自擅，固分非明臣，義亦不附於清，強項獨行，有逐鹿之志，抑亦人傑哉！其後勢乏歸清，不同於叛明。既非明臣，寧得以貳臣論乎？登州之役，有德釋孫元化，以報初恩。桂林被圍，篤城亡與亡之義，舉室自焚，蓋庶乎矢死靡他，見危以授命者。且貳臣惟畏死耳，有德殉節報恩，豈貪生之流！極其事，不過虧夷夏種族之防，詎可拘拘責以君臣之分哉……。

直指乾隆帝不應將孔有德視作貪生畏死的貳臣，並辯稱孔氏本有逐鹿中原之志，故他在降清時已非明臣，且強調他只不過在「夷夏之分」上略失，而不曾虧於「君臣之倫」。的確，三順王本人均不曾叛清，尤其，孔有德還為清朝盡節。

這方石碑上正反兩面的文字乃相隔二百八十年所刻，內容反映了不同時空背景下對孔有德的不同評價。吳橋之變促成孔氏等遼將的崛起，進而影響了明亡清興，此應是大家的共識。至於在道德氣節方面如何定位孔氏等人，則順治和乾隆二清帝明顯出現歧見。辛亥革命之後，政權再次更替，即使中華民國明白宣示「五族共和」，但從新刻在這塊古碑碑陰上的文字，我們仍可強烈感受到三藩之亂以來許多遼人長期且濃重的失落感。他們既遭漢人視作非我族類，也無法被滿人真正認同，而黯然迷失在族群的分際中。

附錄：崇禎初山東人與遼東人間的省籍情結

自金國攻陷遼陽並持續擴張之後，許多漢人被迫逃離家園，由於金國無水軍，故許多難民選擇揚帆過海，他們大多僑居在東江諸島以及山東沿海，尤以登萊地區為多。（註 203）天啟二年（1622），大學士葉向高奏稱遼人避難入關者即達二百餘

203. 畢自嚴，《度支奏議》，新餉司，卷 28，頁 70。

萬人；（註 204）在毛文龍於崇禎二年（1629）被正法時，東江一鎮即有兵民十餘萬人，其中編制內之軍隊共四萬八千名。（註 205）

崇禎初年，登州地區所安插的遼民不下數十萬，其中曾受毛文龍給割加銜者甚眾，以致「登之街市黃蓋、腰金者，不計其數」。（註 206）二年十二月，金軍圍京師，總兵祖大壽自關外兼程趕回，然而，京中之人卻諷刺稱「遼將、遼人都是奸細」；又，黃道周亦力言「東江遼人不早料理，必成極亂」；（註 207）這種種態度均可略窺遼人在一般人心目中的負面形象。陳仁錫甚至嘗建議應將遼人盡數遣回關外，不許他們居留內地，稱：

凡遼人有潛住省直者，儘數出關，以還故土。嚴令各官有姑留遼人者，從重參究，以清內地。遼之科貢、世胄俱許仕遼，以立功勳，不許遊宦，以忘桑梓，俟平定之後，照舊推陞別省員缺，庶遼望先歸，遼眾景從。或路遠難行，官給腳力；或窮餓不前，官給粥食。各府州縣務加體恤，全活孑遺，期歸故業。精壯選之為兵，老弱助之為農；以遼人復遼土，以遼土養遼人，捲土重來之實著也！（註 208）

主張解決遼事的根本方法在「以遼人復遼土，以遼土養遼人」。（註 209）

當時山東人與遼東人之間的摩擦日益嚴重，如皮島遼民即曾於崇禎元年聚眾欲殺至當地公幹的登萊總兵楊國棟，他們訴稱：

自國棟任登，出令強遼人住登者，悉隸官操。富者買免，每名百金，貧者願隸，需索頂缺，每名十八兩，且逐季查補……復出拿奸一令，富商被拿者，動以千金賄之乃釋……有捕獲者，賞有差，為此捕者，罰使出椽木磚瓦，以助尚公（筆者按：「尚公」同「上公」，此指天啟六年十月晉秩為上公的魏忠賢）生祠。吾儕逃生於彼，而受害如此，不能聊

204. 王在晉，《三朝遼事實錄》（《續修四庫全書》景印崇禎元年刊本），卷 8，頁 46。

205. 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補遺》，卷 4，頁 12。

206. 汪楫等，《崇禎長編》，卷 24，頁 10。

207. 同前引，卷 29，頁 17；卷 56，頁 4。

208. 陳仁錫，《無夢園初集》，海集一，頁 39-40。

209. 孫承宗先前即已提出此說。參見孫承宗，《高陽集》（《四庫禁燬書叢刊》景印嘉慶十二年補修本，原刊於順治十二年），卷 19，頁 5。

生，復投生海外。（註210）

知許多遼人在自關外逃難至登州後，卻橫遭欺壓，甚至有被迫再遠赴海外之東江者，以求一活路。

此外，文獻中還屢見描述兩族群間之緊張關係者，稱：「遼人恃其強，且倚帥（筆者按：指毛文龍）力，與土人頗不相安」、「遼人避禍內徙，土人日與為讎，戒諭不悛」、「遼丁貪淫強悍，登人不能堪」、「登萊兩郡自遼陽之失，遼人避亂來奔者十餘萬，土人多折辱之，或相殘殺，遼人怨憤」。（註211）吳橋之變就是在此一山雨欲來的肅殺氛圍中爆發開來。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明代登科錄彙編》，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9。

《明清史料》，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1999。

《明熹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景印舊鈔本。

《明檔》，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清太宗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遼寧省檔案館編，《中國明朝檔案總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文 秉，《烈皇小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續修四庫全書》景印舊鈔本。

方汝翼、賈瑚修，周悅讓、慕榮幹纂，《增修登州府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中國地方志集成》景印光緒七年刊本。

毛承斗輯、賈乃謙點校，《東江疏揭塘報節抄》，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毛 霖，《平叛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70，《叢書集成續編》景印民國十七年排印本。

王士禎著、袁世碩主編，《王士禎全集》，濟南：齊魯書社，2007。

王 充著、黃暉校釋，《論衡校釋》，長沙：商務印書館，1938。

210. 毛承斗，《東江疏揭塘報節抄》，頁115-117；《明熹宗實錄》，卷77，頁5。

211. 此段參見汪楫等，《崇禎長編》，卷55，頁3；程其珏修，楊震福等纂，《嘉定縣志》，卷32，頁10-11；文秉，《烈皇小識》，卷2，頁38；沈徵佺，《江東志》，卷8，頁12。

- 王兆弘等纂修，《新城王氏世譜》，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7，《山東文獻集成（第二輯）》景印乾隆二十五年刊本。
- 王在晉，《三朝遼事實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續修四庫全書》景印崇禎元年刊本。
- 王家彥，《王忠端公文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四庫禁燬書叢刊》景印順治十六年刊本。
- 王 徵著、李之勤輯，《王徵遺著》，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7。
- 王鴻緒等，《明史稿》，臺北：文海出版社，1962，景印雍正元年刊本。
-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
- 任世鐸等譯，《滿文老檔》，北京：中華書局，1990。
- 安雙成選譯，〈順治朝八旗男丁滿文檔案選譯〉，收入閻崇年編，《滿學研究（第一輯）》，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頁413-430。
- 艾 容，《微塵閣稿》，日本內閣文庫藏崇禎七年序刊本。
- 吳 歷著、章文欽箋注，《吳漁山集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07。
- 吳 騫輯、賈乃謙點校，《東江遺事》，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 李光濤編，《明清檔案存真選輯三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5。
- 李肯翊，《燃藜室記述》，漢城：景文社，1976年景印朝鮮古書刊本行會排印本。
- 杜 預注、林堯叟補注、王道焜、趙如源輯，《左傳杜林合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汪 楫等，《崇禎長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景印舊鈔本。
- 沈 淮，《南宮署牘》，日本尊經閣文庫藏明末刊本。
- 沈 演，《止止齋集》，日本尊經閣文庫藏崇禎六年刊本。
- 沈徵佺，《江東志》，上海：上海書店，1992，《中國地方志集成》景印清代鈔本。
- 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補遺》，《續修四庫全書》景印光緒三年（1877）鈔本。
- 周文郁，《邊事小紀》，臺北：正中書局，1985，《玄覽堂叢書續集》景印崇禎間刊本。
- 祁彪佳，《祁彪佳文稿》，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
- 阿 桂、和坤等纂修，《欽定戶部軍需則例》，《續修四庫全書》景印乾隆五十年刊本。
- 昭 槿，《嘯亭雜錄》，《續修四庫全書》景印清鈔本。
- 春秋館編撰，《光海君日記》，漢城：探求堂，1981，《朝鮮王朝實錄》本。

- _____, 《朝鮮王朝實錄》，漢城：探求堂，1981。
- 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徐光啟行略〉，收入張星曜編，《通鑑紀事本末補·附編》，巴黎：法國國家圖書館藏鈔本。
- 查繼佐，《罪惟錄》，《續修四庫全書》景印手稿本。
- 范景文，《戰守全書》，《四庫禁燬書叢刊》景印崇禎間刊本。
- 計六奇撰，魏得良、任道斌點校，《明季北略》，北京：中華書局，1984。
- 倪昌燮等修、施崇禮等纂，《吳橋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9，《中國方志叢書》景印光緒元年刊本。
- 孫元化，《西法神機》，鄭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4，《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彙·技術卷》景印光緒二十八年刊本。
- 孫承宗，《高陽集》，《四庫禁燬書叢刊》景印嘉慶十二年補修本，原刊於順治十二年。
- 孫致彌，《欽左堂集》，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景印乾隆間刊本。
- _____, 《欽左堂續集》，濟南：齊魯書社，2001，《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景印乾隆間刊本。
- 徐石麒，《可經堂集》，《四庫禁燬書叢刊》景印順治間刊本。
- 徐昌治，《無依道人錄》，法國國家圖書館藏康熙六年刊本。
- _____, 《聖朝破邪集》，京都：中文出版社，1984，景印安政三年刊本。
- 徐從治，《圍城日錄》，《山東文獻集成（第二輯）》景印清鈔本。
- 袁翼，《遂懷堂全集》，《續修四庫全書》景印光緒十四年刊本。
- 馬世奇，《澹寧居文集》，《四庫禁燬書叢刊》景印乾隆二十一年刊本。
- 崔懋修、嚴濂曾纂，《新城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中國方志叢書》景印康熙三十三年刊本。
- 張世偉，《張異度先生自廣齋集》，《四庫禁燬書叢刊》景印崇禎十一年刊本。
- 張存武、葉泉宏，《清入關前與朝鮮往來國書彙編（1619-1643）》，臺北：國史館，2000。
- 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點校本。
- _____,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張忻，《歸園日記》，《山東文獻集成（第二輯）》景印清鈔本。
- 張岱，《石匱書後集》，《四庫禁燬書叢刊》景印清鈔本。
- 張思勉修、于始瞻纂，《掖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6，《中國方志叢書》景印乾隆二十三年刊本。
- 戚繼光，《練兵實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本。

梁國治，《欽定國子監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梁蒲貴、吳康壽修，朱延射、潘履祥纂，《寶山縣志》，上海：上海書店，2002，《中國地方志集成》景印光緒八年刊本。

畢自嚴，《度支奏議》，《續修四庫全書》景印崇禎間刊本。

許慎撰、徐鉉增釋，《說文解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郭之奇，《宛在堂文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四庫未收書輯刊》景印崇禎間刊本。

陳仁錫，《無夢園初集》，《續修四庫全書》景印崇禎六年刊本。

陳康祺，《郎潛紀聞》，《續修四庫全書》景印光緒間刊本。

陶朗先，《陶元暉中丞遺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叢書集成三編》景印民國二十五年刊本。

陸隴其，《三魚堂日記》，《續修四庫全書》景印同治九年刊本。

程其珏修、楊震福等纂，《嘉定縣志》，上海：上海書店，1991，《中國地方志集成》景印光緒八年刊本。

鄂爾泰等修，李洵、趙德貴等標點，《八旗通志初集》，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85。

黃宗羲著、沈善洪編，《黃宗羲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1994。

黃虞稷撰，瞿鳳起、潘景鄭整理，《千頃堂書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楊訥、李曉明編，《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遺：據文津閣四庫全書補》，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

楊陸榮，《三藩紀事本末》，北京：中華書局，1985，《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景印康熙五十六年刊本。

楊嗣昌，《楊文弱先生集》，《續修四庫全書》景印清初刊本。

溫睿臨，《南疆逸史》，《續修四庫全書》景印清鈔本。

葉覺邁修、陳伯陶纂，《東莞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6，《中國方志叢書》景印民國十年鉛印本。

補過居士，《東事紀略》，《山東文獻集成（第二輯）》景印清鈔本。

鄒漪，《啟禎野乘一集》，《四庫禁燬書叢刊》景印順治十七年刊本。

聞在上修、許自俊等纂，《嘉定縣續志》，上海：上海書店，1991，《中國地方志集成》景印康熙二十三年刊本。

趙弘恩等修、黃之雋等纂，《江南通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景印

-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趙爾巽等，《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點校本。
- 劉智，《天方至聖實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景印乾隆四十三年重印本。
- 劉懋官修、周斯億纂，《涇陽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9，《中國方志叢書》景印宣統三年鉛字本。
- 劉獻廷，《廣陽雜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67，《百部叢書集成》景印光緒間刊本。
- 談遷著、張宗祥標點，《國榷》，北京：古籍出版社，1958。
- 鄧玉函口授、王徵譯繪，《遠西奇器圖說錄最》，臺北：藝文印書館，1968，《百部叢書集成》景印道光間刊本。
- 黎遂球，《蓮鬚閣集》，《四庫禁燬書叢刊》景印康熙間刊本。
- 錢謙益，《牧齋初學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四部叢刊初編》景印崇禎十六年刊本。
- 儲方慶，《儲遜菴文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四庫未收書輯刊》景印康熙四十年刊本。
- 應寶時修、俞樾纂，《上海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9，《中國方志叢書》景印同治十一年刊本。
- 謝斯茂，《圍城接入書揭》，韓國首爾大學奎章閣藏崇禎間刊本。
- 羅振玉校錄，《平南敬親王尚可喜事實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景印民國十三年鉛印本。
- 嚴有禧纂修，《萊州府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中國地方志集成》景印乾隆五年刊本。
- 釋今釋（本名金堡）編、張允格續編，《平南王元功垂範》，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景印乾隆三十年刊本。
- 顧炎武著、華忱之點校，《顧亭林詩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59。

二、近人論著

- 于瑞桓、何成，〈明末清初新城王氏婚姻簡論〉，《煙台大學學報（哲社版）》，15.2，煙台：2002，頁225-230。
- 方豪，〈孫元化手書與王徵交誼始末註釋〉，《真理雜誌》，1.2，重慶：1944，頁225-228。
- ，《中外文化交流史論叢第一輯》，重慶：獨立出版社，1944。
- 毛佩奇、王莉，《中國明代軍事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王冬芳，《滿族崛起中的女性》，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1996。

王成義，《徐光啟家世》，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09。

* 王景澤，〈明末的「遼人」與「遼軍」〉，《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3.1，北京：2003，頁 26-32。

* 何 成，〈明清新城王氏家族興盛原因述論〉，《山東大學學報（人社版）》，2，濟南：2002，頁 109-113、119。

——，〈新城王氏：對明清時期山東科舉望族的個案研究〉，濟南：山東大學歷史學院博士論文，2002。

宋伯胤，〈孫元化與吳橋兵變〉，《天津益世報·人文週刊》（天津），新 32 期，1947 年 12 月 15 日。

——，〈孔有德底叛明與降清：敬覆郭慕天先生〉，《天津益世報·人文週刊》（天津）新 43 期，1948 年 3 月 15 日。

李大偉，〈孔有德葬地考〉，<http://www.xudewang.cn/search/doc/110694>。

李光濤，〈毛文龍釀亂東江本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9，臺北：1948，頁 367-488。

李學智，〈孔有德、耿仲明降清始末及明史黃龍傳考〉，《幼獅學報》，1.1，臺北：1958，頁 1-24。

李燕光、關捷，《滿族通史》，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1991。

杜家驥，〈清代《玉牒》中的滿族史資料價值〉，《故宮學術季刊》，23.4，臺北：2006，頁 41-62。

定宜庄等，《遼東移民中的旗人社會：歷史文獻、人口統計與田野調查》，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姜守鵬，〈明末遼東勢族〉，《社會科學戰線》，2，吉林：1987，頁 203-209。

故宮書畫檢索 http://painting.npm.gov.tw/npm_public/System/View.jsp?type=1&ObjectID=23
查時傑，〈明末佛教對天主教的「關邪運動」初探〉，收入《明清之際中國文化的轉變與延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頁 485-529。

孫文良、李治亭、邱蓮梅，《明清戰爭史略》，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6。

孫 靜，〈試論八旗漢軍與滿洲的差異性〉，《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社版）》，5，北京：2006，頁 51-57。

徐景賢，〈明孫火東先生致王葵心先生手書考釋〉，《聖教雜誌》，20.9，上海：1931，頁 531-538；21.5，上海：1932，頁 269-277。

張玉興，〈包衣漢姓與漢軍簡論〉，《滿學研究》，7，北京：2002，頁 323-343。

張先清，〈清代中文史料中的徐日昇形象〉，收入 *In the Light and Shadow of an Emperor: Tomás Pereira, S.J. (1645-1708), the Kangxi Emperor and the Jesuit Mission in China*, Anto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 & Artur K. Wardega ed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forthcoming.

- 張書才，《曹雪芹家世生平探源》，瀋陽：白山出版社，2009。
- 張維華，〈南京教案始末〉，《齊大月刊》，1.2，濟南：1930，頁 93-106；1.3，濟南：1930，頁 191-208。
- 細谷良夫，〈歸順于清朝（後金）的漢人〉，收入《清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0，頁 51-59。
- 陳生璽，《明清易代史獨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增訂本。
- 馮其庸，〈兩樁歷史事實和兩件珍貴文獻〉，《紫禁城》，6，北京：2005，頁 98-103。
- * 黃一農，〈天主教徒孫元化與明末傳華的西洋火炮〉，《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7.4，臺北：1996，頁 911-966。
- ，〈劉興治兄弟與明季東江海上防線的崩潰〉，《漢學研究》，20.1，臺北：2002，頁 131-161。
- * ——，〈紅夷大砲與皇太極創立的八旗漢軍〉，《歷史研究》，4，北京：2004，頁 74-105。
- * ——，〈崇禎朝「吳橋兵變」重要文獻析探〉，《漢學研究》，22.2，臺北：2004，頁 361-385。
- ，〈兩頭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
- ，〈奎章閣明清軍事史重要文獻過眼錄〉，《奎章閣》，33，首爾：2008，頁 235-239。
- ，〈e-考據時代的新曹學研究：以曹振彥生平為例〉，《中國社會科學》，2，北京：2011，頁 189-207。
- ，〈正史與野史、史實與傳說夾縫中的江陰之變（1645）〉，收入陳永發主編，《明清帝國及其近現代轉型》，臺北：允晨文化公司，2011，頁 131-202。
- 黃 濬，《花隨人聖盦摭憶》，臺北：文海出版社，1988，《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景印民國三十二年鉛印本。
- 楊國楨、陳支平著，《明史新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楊學琛，《清代民族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
- 葉高樹，《降清明將研究（1618-1683）》，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1993。
- * 董少新、黃一農，〈崇禎年間招募葡兵新考〉，《歷史研究》，5，北京：2009，頁 65-86。
- 靳潤成，《明朝總督巡撫轄區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
- 劉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
- 劉志剛，〈時代感與包容度：明清易代的五種解釋模式〉，《清華大學學報》，2，北京：2010，頁 42-53。

- 劉耘華，〈徐光啟姻親脈絡中的上海天主教文人：以孫元化、許樂善二家族為中心〉，《世界宗教研究》，1，北京：2009，頁 98-107。
- 劉偉華，《千華山志》，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2。
- 劉鳳云，〈清康熙朝漢軍旗人督撫簡論〉，《滿學研究》，7，北京：2002，頁 350-372。
- 樊樹志，《晚明史（1573-1644 年）》，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
- 滕紹箴，〈清初漢軍及其牛彖探源〉，《滿族研究》，1，瀋陽：2007，頁 60-72。
- ，《三藩史略》，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
- 蕭一山，《清代通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1。
- 閻崇年，〈論大凌河之戰〉，《清史研究》，1，北京：2003，頁 48-58。
- 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北京：中華書局，1982。
- * 謝景芳，〈八旗漢軍的建立及其歷史作用〉，《社會科學輯刊》，3，瀋陽：1987，頁 69-74。
- ，〈清代八旗漢軍的瓦解及其社會影響：兼論清代滿漢融合過程的複雜性〉，《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社版）》，3，北京：2008，頁 57-66。
- 魏 剛，〈明與後金對旅順的爭奪〉，《遼寧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2，大連：1999，頁 86-88。
- 魏 特（Alfons Vāth）著、楊丙辰譯，《湯若望傳》，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0 年臺一版。
- 羅志欽編，《袁崇煥研究論文選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
- 龔纓晏、馬瓊，〈關於李之藻生平事跡的新史料〉，《浙江大學學報（人社版）》，38.3，杭州：2008，頁 89-97。
- 神田信夫，〈孔有德の後金への來歸：「天聰七年檔」の検討を通して〉，收入《東方學會創立五十周年記念東方學論集》，東京：東方學會，1997，頁 431-444。
- 渡辺修，〈順治年間（一六四四～六〇）の漢軍（遼人）とその任用〉，收入石橋秀雄編，《清代中國の諸問題》，東京：山川出版社，1995，頁 181-204。
- Dudink, Adrian. "The Sheng-Ch'ao Tso-P'i (1623) of Hsu Ta-Shou," in *Conflict and Accommodation in Early Modern East Asia, Essays in Honour of Erik Zürcher*, Leonard Blussé & Harriet T. Zurndorfer eds. Leiden: E. J. Brill, 1993, pp. 94-140.
- Mote, Frederick W. & Denis Twitchett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7: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pt. 1.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 Vāth, Alfons and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S. J. *Missionar in China, Kaiserlicher Astronom und Ratgeber am Hofe von Peking, 1592-1666*. Cologne: J. P. Bachem, 1933.

-
- * Wakeman, Frederic E., Jr. *The Great Enterprise: 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Dong, Shaoxin & Yi-long Huang. "Chongzhen Nian Jian Zhaomu Pubing Xinkao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Recruitment of Portuguese Soldiers from Macao during Emperor Chongzhen's Reign)," *Lishi Yanjiu (Historical Research)*, 2009.5, pp. 65-86.
- Ho, Cheng. "Ming-Qing Xincheng Wangshi Jiazhu Xingsheng Yuanyin Shulun (Discussion on the Cause Wang's Family's Prosperity at Xincheng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Shandong Daxue Xuebao, Renshe Ban (Journ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02.2, pp. 109-113, 119.
- Huang, Yi-long. "Tianzhujiao Tu Sun Yuanhua yu Ming mo Chuan Hua de Xiyang Huopao (The Christian Convert Sun Yuanhua and the Import of Western Cannons during Late Ming Period)," *Zhongyang Yanjiuyuan Lishi Yuyan Yanjiusuo Jikan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67.4, 1996, pp. 911-966.
- _____. "Hongyi Dapao yu Huangtaiji Chuangli de Baqi Hanjun (Dutch Cannons and Huangtaiji's Creation of an Ethnic Han Army)," *Lishi Yanjiu (Historical Research)*, 2004.4, pp. 74-105.
- _____. "Chongzhen Cao 'Wuqiao Bingbian' Zhongyao Wenxian Xitan (A Study on Ancient Accounts of the Wuqiao Mutiny of 1632-1633)," *Hanxue Yanjiu (Chinese Studies)*, 22.2, 2004, pp. 361-385.
- Wakeman, Frederic E., Jr. *The Great Enterprise: 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 Wong, Jingze. "Mingmo de Liaoren yu Liaojun (Liao People and Liao Army during Late Ming)," *Zhongguo Bianjiang Shidi Yanjiu (China's Borderland History and Geography Studies)*, 13.1, 2003, pp. 26-32.
- Xie, Jingfang. "Baqi Hanjun de Jianli ji qi Lishi Zuoyong (The Founding and Historical Functions of an Ethnic Han Army)," *Shehui Kexue Jikan (Social Science Journal)*, 1987.3, pp. 69-74.

“The Wuqiao Mutiny 吳橋兵變”: An Important Fuse for the Ming-Qing Cataclysm

Huang, Yi-long

Institute of History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eighth month of the fourth year of Emperor Chongzhen's 崇禎 reign (1631), Huang Taiji 皇太極 (1592-1643) led an attack on the Dalinghe Castle 大凌河城 outside the Great Wall. Four months later, the army of Kong Youde 孔有德 (c.1604-1652), who had acted under the orders of Sun Yuanhua 孫元化 (1581-1632) and protected Dalinghe Castle, revolted against the Ming in Wuqiao County and subsequently surrendered to the Manchus. This mutiny was outwardly triggered by a conflict between a soldier and the local people caused by a seized chicken. Although it started with a seemingly trivial incident, the mutiny at Wuqiao had a butterfly effect and caused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dynastic transition betwee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is paper illustrates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Wuqiao Mutiny in the hope of calling more attention to this event in the research of Ming-Qing history. It provides a thorough examination of the cause and course of the Wuqiao Mutiny, as well as analyzing how the Han families of Liaodong 遼東, including that of Kong Youde, Geng Zhongming 耿仲明 (?-1649), Shang Kexi 尚可喜 (1604-1676), and Wu Sangui 吳三桂 (1612-1678), rose to power after this military revolt. These families started out as local military forces, but entered the political power core of the Qing government, and eventually lost their power after Kangxi Emperor 康熙皇帝 quelled the Rebellion of the Three Feudatories 三藩之亂 (1673-1681).

Key words: Ming and Qing history, military history, Wuqiao Mutiny 吳橋兵變, Kong Youde 孔有德, Sun Yuanhua 孫元化

(收稿日期：2011.3.3.；修正稿日期：2011.5.16.；通過刊登日期：2011.5.26.)

